

# 我的一生

方福森教授自传及弟子亲友回忆集

方福森·著

邓学钧 陈荣生 程建川 等·整理

MY LIFE

Memoirs of Professor Fang Fusen



方福森教授（1910—1997），  
福建福州人，我国第一位留学波兰博士，  
道路工程教育奠基者之一。  
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无私奉献给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  
及交通运输事业，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 01 少年时期

我——方福森，字友孟，1910年6月11日（即农历宣统二年庚戌年五月初五，端午节）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祖先是从小河南省固始县迁至福建省连江县，清中叶又从连江迁至福州。祖父方珊瑚早年在福州一个布店里当学徒，后因布店蚀本倒闭，遂随一名中医郭永淦学习中医技术并颇有成绩，在大瘟疫中救治了不少病人，对贫苦的大众还免费施诊并赠送药物，甚得民众爱戴与敬重，成为著名中医。我祖父生有五男二女，我父排行第二，伯父耐尘在福州银行服务多年，三叔幼年夭折，四叔博九和五叔兆景（字行维）都继承祖父学习中医。四叔一直在福州行医。五叔曾在北京和南京行医，是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行医，深得上海居民的欢迎。大姑嫁傅家，二姑嫁林家。

我父兆鳌，字策六，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甚深，是旧式学者，在清末科举考试中考取进士第51名，后因50名以内的进士都晋升为翰林，我父也破格升为翰林。后来看到清朝腐败无能，非维新不足以救亡兴邦，遂与数好友结伴东渡日本留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翌年还招我五叔去日留学。我父曾在北洋政府任铨叙部参事，因军阀混战，公教人员时常欠薪，家中经济一直较困难，当时公教人员常被称为“灾官”。30年代初我父应国民政府铨叙部林翔部长的聘请到该部任秘书兼司长；抗日战争期间曾任教于北平大

学,课程繁重,收入仅是糊口而已。我父于1960年2月逝世于上海,享年85岁。我母黄兰,一直操持家务,1958年5月逝世于上海,享年72岁。我兄弟六人及一姐,我排行第二。兄东,字障川;三弟富桢七岁早逝;四弟福枢,字立中;五弟福桓,六弟福林;姐福柔,字慧遗,姐夫陈声聪,字兼宇。

1912年我2岁时即由父母带到北京,幼年读私塾,老师姓俞,教四书五经,只求背诵,不求甚解,收获不大。那时我的表兄傅荫烈、林世贤和堂兄福湛、福铨等也来北京上学或谋职业,都住我家,我从他们那里学习算术、英语、地理等知识。1923年8月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初中部,因英语成绩特优,被准予跳班上课。当时同班同学有钱学森,我因眼近视较深,被安排坐在第一排,钱就坐在我的后面。我班的历史老师(姓名已记不清了)是很进步的,他一上课,不讲历史,而大讲时事政局形势以及青年人应走的道路。我从他那里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教育,感到以前所学的四书五经不合潮流,无何用处,就忘得一干二净。

那时正值北洋政府执政、军阀混战时期,又是日本开始侵略我国时期,我厌恶北洋政府的腐败无能,并仇恨日本,几次参加北京大中学校学生所组织的为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和宣传抵制日货的游行活动。那时北师大附中要求全校学生都要参加童子军,我也参加了,着童子军服,练习打旗语和结绳等技术。1926年初中毕业,径直考入师大附中高中部。那时国内有些大学还附设预科(相当于高中二、三年级),毕业后可直接升入本科,无须再考,所以我读完高中一年级后决定投考大学预科。这样我在中学共读了4年,由于英语和数学学得较好,4年8个学期均获得优异成绩。但因我喜欢打篮球,荒废了不少时间,所以其他课程只保持了中等水平。

## 02 大学时期

我父亲是搞古典文学的，大兄跟随我父亲亦步亦趋，对文学也有较厚实的功底，能写文章会做诗词，我则缺乏这种基础条件。我幼年喜欢绘画车船，并用硬纸折叠制造车船，而且我的逻辑推理能力比较强，对数理化感兴趣，适合于搞理工科；另外，我由于在中学时期受过爱国主义的启蒙教育，所以怀有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思想；加之，那时理工科人才在国内非常短缺，社会上也鼓励和提倡青年学理工，鉴于这些原因，我决定学理工科。当时天津北洋大学历史悠久，是我国北方著名的理工科高等学府，校长茅以升又是国内著名学术泰斗。该校毕业生大多分配在铁路、矿山部门工作，待遇优厚，被认为是“铁饭碗”。该校设有二年制的预科，所以我于1927年读完高中一年级后即去投考该校预科，被录取。我首次离家，父亲很不放心，亲自送我去天津西沽北洋大学报到，感到学校学习和生活环境都很好，也就放心了。我在北洋预科学习期间，英语是由美籍教授 Latimore 授课，讲课、笔记等全部用英语。高等代数和解析几何分别由张某（绰号张 Square）和冯某两教授讲授，他们也都用英语讲课，他们都有40多年的教学经验，上课时不带课本、讲稿和笔记本，但会在黑板上用粉笔写下完整的授课内容，这样就奠定了我的数学基础。

我在北洋上学时，酷爱排球和网球运动。1929年春华北运动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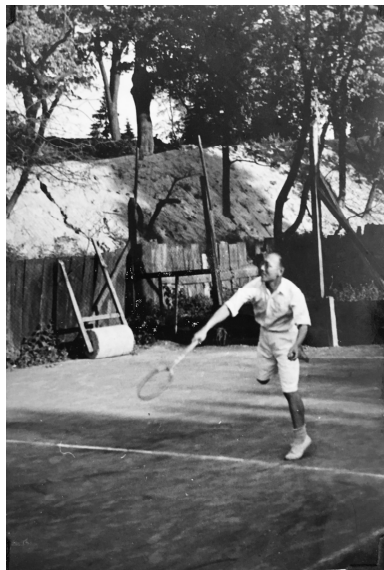
在沈阳举办,我曾被选入北洋大学排球代表队前往参加比赛。张学良在北陵公园安排茶会欢迎全体运动员,我感到张学良在东北励精图治,积极进行经济建设,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都蓬勃发展。若全国各地都像他那样积极推进建设,中国大有希望。同我一起从师大附中考入北洋预科的还有同班同学孙启昌,在2年的预科学习期间,他都和我住在同一宿舍寝室内,他为人和蔼善良,乐于助人,我在生活和学习上得到他不少关怀和帮助,至今难忘。

1929年的初夏,北洋大学发生大火,一座宏伟的教学实验大楼一夜之间变成瓦砾废墟,校长茅以升引咎辞职。我感到北洋已趋向没落,没有前途;而且该校远在天津,办学经费一直很拮据,就产生转学的念头。考虑到清华已由留美预备学堂改建为综合性大学,经费充足,师资雄厚,而且正在增办土木工程系。水木清华,环境幽美,其名声已超过北洋,所以我很想投考清华。但父母亲则主张我投考北京税务专门学校,因为在税专毕业后可直接安排在海关工作,待遇优厚,被认为是“金饭碗”。我则举棋不定,两者都去投考。结果我被清华录取而税专则由于竞争太激烈被淘汰。那时我对北洋还有一些恋恋不舍之情,曾想回北洋继续读本科,而父母亲极力反对,这样我就去清华报到,由父亲的好友林蔚章和邵继全做保证人,进入清华土木系学习。

那时清华土木系主任是施嘉炆教授,在选读一年级课程时,首先需参加大学化学的甄别考试,并呈缴中学时的化学试验报告,若不及格,则需先选读预备化学一年,然后才准选读大学化学。我参加这项甄别考试获得通过,但化学系主任张子高教授发现我的试卷字迹较潦草而试验报告字迹较工整,怀疑我所呈缴的试验报告是用他人的试验报告冒名顶替。我申辩说试卷字迹潦草是因为考试紧张匆忙所致,而试验报告则可从容不迫慢慢抄写,故字迹较工整,这才打消了张教授的怀疑,允许我直接选读大学化学,这也可说明清华教授的严谨作风。

但是我在一年级时仍未能选读大学化学,因为那时试验课和实

习课太多,都安排在下午,如选读大学化学,则化学试验 2 个下午、物理试验 2 个下午、工程制图 2 个下午、工厂实习 1 个下午,共 7 个下午无法排课,我只好把大学化学放在二年级选读,而在一年级先选读应用力学课程。众所周知,应用力学最好在读完大学物理后再选读比较合适,符合循序渐进原则,而我则在一年级同时选读应用力学和物理两课,致使我应用力学学得较差,这给了我非常深刻的教训。



在清华打网球

我在清华读书时教过我的教师情况如下:微积分由孙光远教授和唐培经讲师担任,物理由萨本栋教授和沙正彦讲师担任,英语由陈福田教授担任,陈的洪亮正统的英语口语,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体育课由马约翰教授担任,上课大多在体育馆内,他一上课首先喊:“Boys, hurry up, sixteen rounds.”。到毕业时规定游泳至少要游到 12 米,才算及格准予毕业。可是我到毕业时还达不到这个标准,幸亏我班级毕业时因时局关系未能进行这项测验就毕业了。



在清华打篮球

至于技术基础课和专业课,为我班讲授最多的首推系主任施嘉炆教授,他讲授了工程制图与画法几何、材料力学、测量学、路线测量与土方、应用天文学、水力学、水文学、水电工程与河港工程等课程。他在一年级至三年级都用英语讲课、写笔记和出习题,到四年级才改用汉语。他还利用星期天带领全班同学测量清华园至西直门的铁路和公路

路线。其次是陶葆楷教授，他讲授了给水工程、下水工程、都市卫生、卫生工程设计与卫生工程试验等课程。其他还有蔡方荫教授讲授结构学和圬工及基础；王明之教授讲授工程材料和钢筋混凝土结构及设计；张泽熙教授讲授铁路工程及设计；崔龙光教授讲授道路工程及设计和道路材料试验；罗邦杰教授讲授应用力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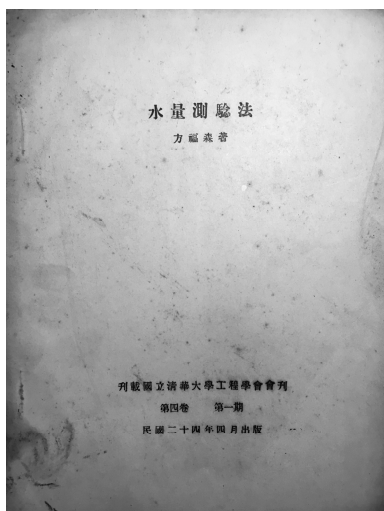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清华土木系已开始将四年级分成四个学科组，即结构、水力、路工和卫工四组，供

同学凭志愿和兴趣选读，这在国内尚属首创。另外，有些课程，如应用天文学、都市卫生、卫生工程试验和道路材料试验，都属新兴课程，也是清华土木系首先开出的，国内其他大学尚都未能开设这些课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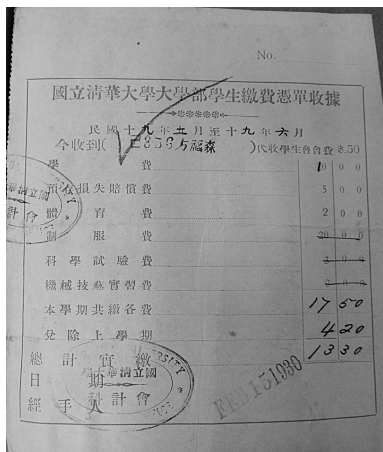
我在清华一年级读书时，是住在三院学生宿舍内，同寝室的同学尚有乔冠华、刘全忠、张民觉和徐乃祚等。到二年级适明斋宿舍建筑落成，我级同学都分配在该宿舍居住，我同外国文学系的同学甘毓津住同一寝室，直到毕业。那时清华规定学生每学期要缴纳学费 10 元，4 年共 80 元，到毕业时会全部退还本人。我班部分同学就利用这笔费用，在将近毕业时赴各地参观旅行，为期十余天。我们在天津参观了北洋大学、海河工程和沥青混合料搅拌厂；在南京参观了中央大学、长江轮渡码头和中山陵；在上海参观了交通大学、商业大厦建筑工地和沥青混凝土搅拌厂；在杭州参观了浙江大学、钱塘江大桥工地和西湖风景区。

大学期间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我在清华二年级读书时，常患感冒伤风症，经医生检查称是因为扁桃腺肿大，需手术切除，我就利用暑假，住进清华医院进行手术。由于医生、护士的疏忽大意，一夜之间吐了一大脸盆鲜血，幸亏翌日晨医生来视，急用大量冰块围住颈部，这才止住了血。我出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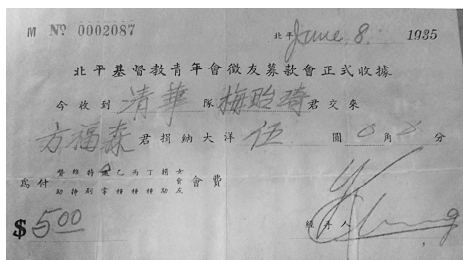


后紧接着又参加了施嘉炀教授、沙玉清、陈永龄和夏坚白助教率领我班和1932级土木系同学去青岛进行暑期大地测量实习,这样我终于因切割扁桃腺失血过多,加之测量实习劳累,又未能及时进补休养,以致元气大伤,开始记忆力衰退,头发脱落,对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产生不良影响,给了我很大教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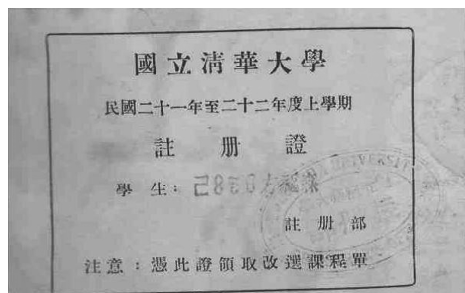


1931年秋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在清华读书期间的学费收据同学们为了抗日救国,曾自发停课组织义勇军,实行军训,徒手操练,约1~2星期即结束。我在清华期间,福建籍的师生员工曾组织福建同乡会,每年召开两次会,一次是在秋季欢迎新来的福建籍师生员工;另一次是在夏初欢送将离校的福建籍师生员工。

我的大兄东是在燕京大学政治经济系1928年毕业的,他的同学张训达和林其煌在北平开办华光女子中学,1930年暑假该校举办暑期补习班,我因家中经济困难曾由我兄东介绍去该补习班讲授几何代数,为期2个月,获得60元报酬,聊补我暑期后的学费。



在清华读书期间的捐款收据(梅校长签收)



清华大学注册证



清华大学授课证



## 03 大学毕业后

1933年6月华北抗日战争失利,日寇侵占热河进逼平津,形势危急,学校不得已提前放暑假,紧急疏散。我班级同学没经过大考,也没举行毕业典礼,就匆匆各自走散。那时我姐夫陈声聪正在北平市政府当秘书,而比我高两班的北洋同学谭炳训正在该市府任技术室主任。8月间我经过他们两人的介绍进入该技术室任技佐。任务比较轻松,只是一些房屋、街道、上下水道的查勘修缮工作,没有什么实际工程可做。我觉得长此下去,所学专业就要荒废,就于1934年1月应开封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征聘任助理工程师,主要搞河道测量工作,计算河道走向及测点经纬度。当时在该委员会工作的还有清华同班同学谈尔益,但因我搞内业,他搞外业,很少有机会晤谈。那时我对河道测量内业工作感到很单调乏味,所以想谋求公费留学,但一般规定需大学毕业并有两年工作经验方可报考,否则需由学校推荐才准报考。1934年6月底我回北平请求清华母校推荐报考清华公费留美生,但因毫无准备,自知考不取,只是为了获取一次考试经验而已。

那时我因父母亲年迈体弱乏人照顾,而且回清华当助教便于准备投考公费留学,我就写信给正在德国休假访问研究的施嘉炆老师,同时与代理系主任蔡方荫老师联系,经他们两人同意我回清华土木系任助教,担任土木、机械、电机三个系的材料试验和水力试验

以及土木系水力学和道路材料试验等课程的辅导工作,并抽空准备投考公费留学。1934年冬我经父亲好友李乔平的介绍,同北平商业专门学校毕业的孙江嫫订婚。那时施嘉炆老师自德国来信,要我去卢沟桥附近永定河中挖取泥沙样品寄往德国进行试验研究,我遵命带领两名技工前往挖取泥沙试样百余个寄往施师处。1935年暑假我随张泽熙教授率领1933级土木系同学去西山、香山等处进行暑期测量实习参加辅导。带实习回来我再次投考清华公费留美生,我的总分列第二名未被录取,甚为懊丧。1935年冬日寇进逼北平,学校决定南迁长沙,我协助系里员工拆卸水力试验室仪器设备,并装箱用卡车送往清华园火车站南运长沙。

## 04 赴波兰留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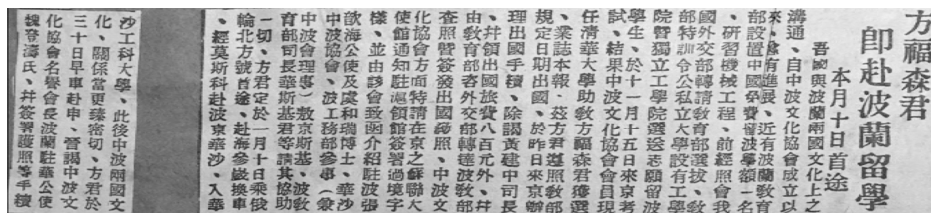
1935年10月间我看到报纸登载前教育部招考波兰政府奖学金留学生1名的启事,凡大学土木系或机械系毕业并有2年以上工作经验者均可报考,奖学金每月250兹罗提波币,约合国币170元,来回旅费和置装费800元由我国教育部资助。我报了名,并于11月15日赴南京参加考试,共约十多人。11月底我接到教育部通知我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并限12月底以前到南京办理出国手续。当时有些人认为波兰工业技术落后,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应放弃这次留波机会,等待其他机会出国,我也犹豫不决。但我兄东则极力鼓励促进,认为我家兄弟中还没有出国留学的,我是第一个,我能获得这次出国机会,也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放弃实在可惜;况且这是我国教育部派往波兰的第一名波兰政府奖学金留学生,还是大有作为,至少在中波文化、科技和工商业交流方面可以做一些事情。

这样我就向梅贻琦校长以及各位师长和同事辞行,陶葆楷、蔡方荫和张任三位老师还在工字厅西餐馆为我饯行。12月25日我到南京向教育部报到,谒见吴建中司长并领取去波兰的旅费和置装费。吴介绍我去会见中波文化协会理事郭有守,郭介绍我加入中波文化协会为会员,并嘱咐我不要取道经东北三省到西伯利亚的路线,担心满洲日伪当局会因我是我国派往波兰政府奖学金留学生而

加以阻挠刁难,建议我由上海乘船到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再乘火车经伯力(哈巴罗夫斯克)、斯克沃罗丁诺、赤塔、莫斯科的路线。郭还告诉我,我国出席1934年国际劳工大会首席代表、国际劳工组织理事院常任理事长李平衡也是取道这一路线去巴黎,而且他已把我去波留学的情况告诉李平衡,请李在旅途中给予指导和帮助。我表示同意,当即赴外交部办理手续、领取护照,并去中央医院检查身体。29日我转往上海谒见波兰驻华公使兼中波文化协会理事长魏登涛(Weythental)先生并办理赴波签证,同时,还去苏联驻沪领事馆办理过境签证。最后还要购买行装并委托国际旅行社购上海至海参崴的船票以及海参崴至华沙的火车票和就餐券(此情况在当时上海报纸曾有报导)。



方福森留学波兰的护照



当时报纸刊登方福森即将赴波兰留学的消息(1936年)

1936年1月23日,即农历元旦,我四弟福枢、堂弟福铨、姐夫陈声聪和友人张训达、陈长津陪送我到外滩码头乘小船横渡黄浦江,登上苏联客轮北方号。该轮载重3000吨级,我坐2等舱,在海上颠簸了6天,头晕呕吐不已,不能起床用餐。同船还有李平衡夫妇,偶尔在餐厅用餐时遇见他们。他们安慰我说,大家都一样,都是几天没吃多少东西。该客轮沿途不停靠任何港口,直驶海参崴。船经过



在赴波途中船上留影

朝鲜海峡时,遥望釜山港,灯火辉煌,甚为热闹。1月29日凌晨抵达海参崴,但因冰冻不能驶进港口码头,经苏联破冰船队的努力奋战,于当日夜晚11时才得驶进码头。上岸后苏联边防站和海关检查甚严,几乎是翻箱倒柜。我所带的书籍及一枚“中波文化协会”印章被抄去做详细检查后还给我。另外,我所带照相机、书籍等重要物品则被锁进一个大箱内加上封条,嘱咐我在苏联境内不准开启,其他零碎物品则装入小箱内,可以随时打开使用。

国际旅行社派人把我和李平衡等人送往一个较大的宾馆暂住。翌日晨我国驻海参崴领事馆派车接我等去该馆休息并设宴招待。我住宾馆2夜,2月1日晨结账为137卢布。当时我身上带的是美钞,如以苏联官价折算,应支付约50元美钞,吃亏太大。李平衡见我尴尬窘状,主动提出我的宾馆宿费并入他的宾馆费用,由他负责以外交官身份支付。我当即表示感谢。李等在海参崴还要滞留三五天,然后乘火车去巴黎。

随后驻海参崴领事馆派人送我到火车站,登上西伯利亚大铁路1.524米宽轨距列车,车厢较我国标准轨距铁路车厢为宽,所以卧铺较长,走廊通道较宽。我坐的是硬卧车,车厢位于列车后半部。车厢内沿纵向一侧设置约9个能容纳4人的包间,每个包间设上下铺各2个,我在上铺,其他3人均均为浙江温州、青田一带同胞,他们都是去欧洲做生意的,在火车上他们都未购买就餐券,而在沿路车站上采



在赴波途中列车上留影

购食品,生活很艰苦。他们不懂普通话但略晓英语,我只好用英语同他们交谈。列车准时于上午 11:30 开行。那时正值严冬,大雪封山、白色皑皑、天气晴朗、阳光照射、缤纷灿烂、闪耀夺目,令人兴奋不已。但是遥望铁路左侧,就是我国东北三省,现已被日寇侵占,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使我产生极大愤慨。

当晚 11:30 列车抵达伯力,众乘客均准备脱衣卧睡,因包间内太热,门未关紧,我的皮大衣就挂在门旁的挂衣钩上,忽有一歹徒拉开房门,一手抢我的皮大衣,另一手欲抢我放在卧铺上侧箱架上的手提箱,我即大喊大叫,三位浙江同胞也都起床和我一起追赶歹徒,歹徒终未能劫走手提箱,但已把我的皮大衣劫走。由于我们的包间正好位于车厢尾部,而车厢的门又未锁牢,歹徒很容易从车厢门处跳下逃走。存有我的护照和钱钞等重要物件的手提箱未被劫去,我已是万幸,如被劫去则可能影响我的前进行程。当夜我万分懊丧,彻夜不眠。翌日晨我在餐车用早餐时,遇见一位驻上海的塔斯社新闻记者,我把昨夜被劫事件经过详细告诉他,他大为吃惊,并为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竟还发生这种丑事,对我表示遗憾和歉疚,还把他所带的较薄的一件冬大衣借给我在旅途中穿着,等到达莫斯科后再设法送还给他,同时,将他在莫斯科的住址抄给我。

因为时值严冬,列车车厢门窗都关闭得很密实,车厢里温暖如春,有人在玩扑克牌、玩棋,有人读书看报,有人在闲聊谈天,有人在闭目养神,车厢走廊通道上不时有服务小姐叫卖瓜子和糖果,车厢的走廊通道的一侧设有翻板式座椅和小桌。列车长途跋涉,我闲来无事,总喜欢坐在翻板式座椅上瞭望车窗外的风光景色。大地冻土结实,一片洁白,行人非常稀少,途经辽阔的西伯利亚大草原和奇妙的贝加尔湖时,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沿路尽是大片的、绵延不断的、参天的原始白桦森林和红松森林。虽是冰天雪地的严冬,树木仍是苍翠欲滴、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挺拔矫健、笔直挺立,白的可爱,绿的动人。当然也有的树枝上栖留或凝结着雪花或霜花。树干高几十米,十分潇洒壮大,气度非凡。这种令人陶醉的异国风情顿使我

感到新奇并忘却了长途旅行的辛劳。由于木材丰富,所有农舍房屋都是木结构,高的二三层,低的只是一层。偶见有头戴皮帽,足蹬皮靴,身着毛皮大衣的人,坐在马或狗牵拉的雪橇上驰骋于湖上河中;有的在溜冰滑雪,还有些小孩则在雪地上追逐嬉戏。但途经莫斯科、沃罗丁诺、赤塔、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彼尔姆、基洛夫等大中城市时,却是人烟鼎沸,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工厂林立,车水马龙,灯火辉煌,热闹非凡,甚为繁华。列车每到一个车站,偶尔我也下车到站台上舒展一下,看见很多人都在采购食物,人们嘴里呼出的热气都到眉毛或刘海上结成“霜花”。

经过 12 天的颠簸跋涉,我终于在 2 月 12 日凌晨抵达莫斯科,当即乘出租车去我国驻苏大使馆,遇见该馆随员、清华三级学长谢子敦。我即把在火车上遭劫的情况告他,并托他设法把大衣送还给那塔斯社记者。据谢说在苏联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有时歹徒会把所劫得的无价证件,如护照、身份证等通过邮政信箱寄到大使馆退还给被劫者。谢学长很热诚,主动打电报给华沙我国驻波公使馆,告诉对方我抵达华沙的日期和时间,并陪同我参观红场、地下铁道、大型商场和莫斯科市容,邀请我午餐和晚餐。晚 9 时,谢学长送我到火车站,我们才知道在莫斯科需换车。我所带行李已全部由三位浙江同胞代为搬到另一向西开行的列车上,我即表示感谢。2 月 13 日清晨抵达苏波边境小城明斯克,经过一番严格的边防站和海关的行李检查后,即由波方车站青少年服务员将我的行李搬到横跨欧洲的 1.435 米标准轨距国际列车上。我购的是二等卧票,二人一间,所以很舒适。

我于 2 月 13 日晚 10 时抵达华沙车站,当即有我国驻波公使馆随员兼中波文化协会理事虞和瑞博士来迎接,接我去他家留宿一晚。虞为人热诚和蔼,我以后在波学习和生活,受到他不少帮助和关怀。虞熟悉波兰语文,夫人为波兰裔。14 日虞就陪我去波兰教育部报到,由于我是该国政府奖学金资助的第一名中国留学生,该部也极重视,立即安排我住进外国留学生宿舍,一人一房,月租金 45 兹

罗提。我在去波之前并未学过波语,在生活和学习上都遇到困难,波兰教育部有意识地指定几位懂英语的外国留学生同我接触,其中有来自澳大利亚的 Zygmunt Kaczonowski、来自美国的 Smolenski、Kozuchowski 和 Carl John Dwankowski 以及来自加拿大的 Sedziak 和 Walter Wojcik,还有来自英国和印度的访问学者。当时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学生也来波兰留学,如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芬兰、希腊、丹麦、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爱沙尼亚和南斯拉夫等国。

随后我又去谒见我国驻波公使张歆海,他是清华老学长,对我表示欢迎,并愿大力协助。后来虞和瑞又介绍我谒见波兰交通部参事兼波中文化协会理事敖京斯基(M. S. Okecki),他在 1932—1934 年间曾由国际联盟派来我国担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公路处技术顾问,他对我来波留学甚表欢迎并愿给予大力支持和关注。我原先在清华土木系是学水利的,原想继续研读水利工程,但敖氏认为我国正在发展公路建设,亟需大量公路人才,极力说服我改读道路工程,我只好表示同意。他当即为我联系华沙工业大学土木系教授兼道路教研室主任纳斯托罗维奇(Melchior Nestorowicz),纳氏同意接纳我为该校博士研究生并由他任指导教师。我即办理入学手续,呈交清华毕业证书和各门课程成绩报告单以及工作证件等,并同他制订学习和研究计划,呈报华沙工大和波兰教育部备案。

在波学习和研究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自 1936 年 2 月至 9 月共 8 个月,主要包括如下四方面:

### 1. 波文学习

最初我参加了一个专门为外国人设置的波语突击学习班学习 2 个月,后又被介绍到一位名为 Stefan Goldwasser 妇女处学习,每周 3 次,每次 2 小时。由于当时留波的中国学生只有我一人,在日常生活中只得同波兰人交往,这对我学习波文倒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到 1936 年 9 月我基本上掌握了波语,能听、能说、能读。



## 2. 在华沙道路试验研究所实习

该所为波兰交通部与华沙工业大学合办,所长即为前述的纳斯



在波兰实验室工作

托罗维奇教授,副所长为 Wladimierz Skalmowski 博士。实习内容主要是各种筑路材料的试验研究分析。

所内设置如下几个室:

(1) 石料、沥青(包括地沥青、石油沥青、煤沥青、液体沥青和乳化沥青)与沥青混合料

室,主任由 Skalmowski 兼任,研究员有 Jadwiga Bierencwaj(女,二次世界大战后仍在华沙工作,改名为 Lewitasowa)、Maczynski(二战后任华沙工大教授)和 Jastrzebski(二战后去美国某大学任教授)等;  
(2) 水泥与水泥砼室,主任为 Antoni Kobylinski,另有研究员若干人;  
(3) 土壤与炼砖室,主任为 Feliks Essay,研究员有 Sarkisow 等,此外还有研究员 Stanislaw Lenczewski 等人。

## 3. 在筑路材料工厂实习

其中包括:(1) Trwnaly Drogi 沥青砼与沥青砂搅拌厂;  
(2) Oltarzew 炼砖厂,厂长为 Waclaw Maciejewicz(二战后任华沙工大教授);  
(3) Katebe 水泥砼预制块工厂,主要生产路用双层六角形砼预制块,还附带生产冷铺沥青碎石混合料,主任为 Stankiewicz;  
(4) Kemi 乳化沥青与沥青玛蹄脂工厂;  
(5) Janowa Dolina 采石场,该场有天然的石柱林,由无数根断面为六角形的玄武岩石柱,整齐、紧密地排列、堆垒成高达 10~15 米的弧形陡壁,每根石柱直径约 40~80 厘米,高约 2~5 米,景色甚为奇特,岩石经采掘后用手工或切石机凿成小方形或矩形石块,供铺路用。

## 4. 在道路工地现场实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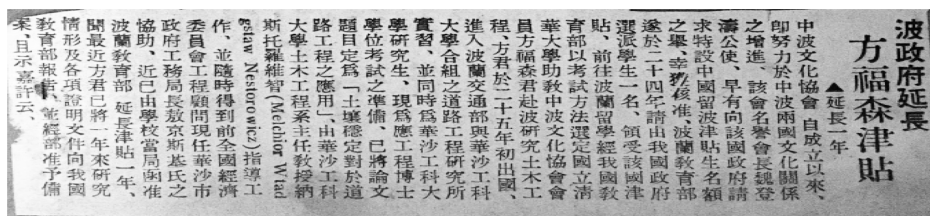
其中包括:(1)华沙至罗兹公路上 Lowicz 城附近的炼砖路面、石块路面和双层六角形砼预制块路面;(2)华沙至 Modlyn 公路上

Radzimin 城附近水泥砟路面,工地主任为 Jan Rozycki 和 Jan Szacillo 两工程师;(3)华沙市干道沥青砟路面和煤沥青碎石路面。此外还参观了 Modlyn 和 Plock 两城附近的钢筋砟桥和钢桥的改建加固工程以及 Roznow 水电站 Dunajec 河大坝施工现场。

第二阶段的学习和研究自 1936 年 10 月至 1938 年 5 月共 18 个月。因波兰奖学金原定为 1 年至 1937 年 1 月期满,而我为了获取博士学位至少需 2 年半,所以在 1936 年底由华沙工大备函波兰教育部要求将奖学金延长 1 年至 1938 年 1 月为止,获得批准(此事在当时上海报纸上曾有报导)。后又由华沙道路试验研究所继续以工程师名义,每月发给生活费 250 兹罗提,共 4 个月,至 1938 年 5 月为止。



在波兰工地勘察



上海报纸刊登波兰政府延长方福森津贴的报导

第二阶段的学习和研究又可分为如下三个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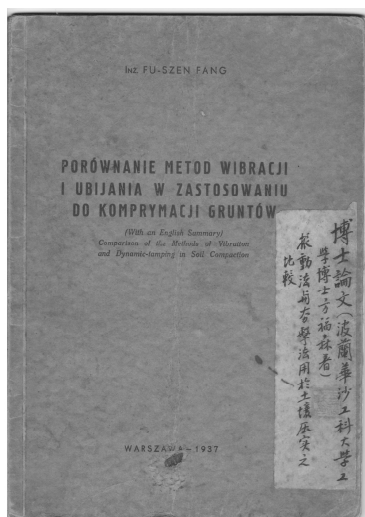
### 1. 论文选题

当我刚被接纳为华沙工大博士研究生时,导师纳斯托罗维奇即与波兰交通部参事协商,认为结合中国国情需要,应研究有关道路土壤稳定与加固方面的课题。我即收集并阅读这方面的大量文献资料并写出详细笔记。后来感到题目太大、范围太广难以下手,经与导师商量并经他同意,决定改为《振动法与夯击法应用于土壤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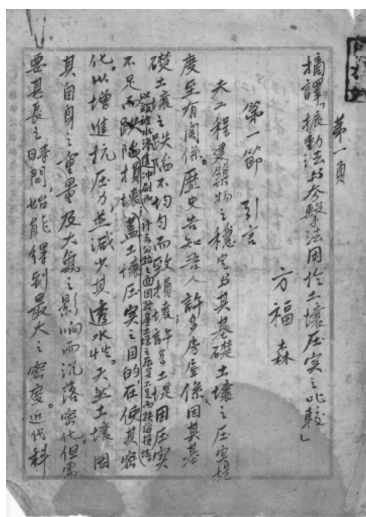
实之比较》。

## 2. 试验研究与撰写论文

论文题目选定后,即着手采集土样;设计和制造试验仪器设备进行试验;同时,继续收集和阅读有关文献资料。此外还向华沙工大力学教研室有关教师学习关于振动力学计算问题。1937年9月开始撰写论文,12月底完成,呈交导师审阅校正通过,即被选登入《华沙道路试验研究所1937年论文集》中。后来1952年我看到英国 Bernard H. Knight 所著“Soil Mechanics for Civil Engineers”一书,他已将我的博士论文作为参考文献之一列入该书中。



方福森博士论文首页



方福森回国后翻译的自己博士论文摘要首页(给交通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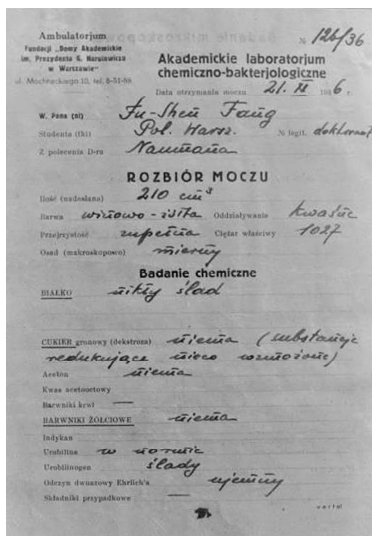
## 3. 论文答辩

1938年2月下旬华沙工大即组成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是该校教授兼土木系主任 Antoni Ponikowski(曾任华沙工大校长);委员有该校教授兼钢筋砼教研室主任 W. Zenczykowski 博士,该校教授兼铁道教研室主任(姓名我已记不清了)、该校土力学教授 Radzimir Pietkowski 和我的导师 Nestorowicz(曾任该校土木系主任)共4人。论文经答辩委员会通过后,即在华沙工大礼堂举行博士

学位授予典礼。我国驻波公使馆派随员虞和瑞博士和秘书李永福等人参加。

此处还需指出的是：(1)我的博士学位全名应是“技术科学博士”学位；(2)在博士学位证书上载明我的出生年月是1909年5月5日。这是按照我国传统的旧式农历推算的，按照这一传统旧农历计算年岁时，把婴儿出生的年份定为1岁，第二年为2岁，……，依此推算，我获得博士学位时的岁数为29岁，即俗称的“虚岁”，而出生年份即为1909年，但事实上，我是出生于庚戌年，即1910年。另外，按照我国传统的旧农历计算，我的出生日期为5月5日，即农历端午节，将此换算到现行的阳历应为1910年6月11日。我在新中国成立前，一直沿用传统的旧农历来填写我的出生年月，包括中学、大学的入学和毕业年月，直至1949年10月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后，才改用现行的阳历出生年月。

1936年4月间我刚到华沙不久即患病，每隔一天夜间发高烧，体温达39~40℃，一进食即呕吐。我孤处异国，语言不通，顿生思念祖国家乡之情，当时我极为懊丧，心想我可能命里注定生为中国人，死为波兰鬼。幸亏来自澳大利亚的留学生Kaczanowski极为热诚，为我购买食物、日常用品及简单药物。但数日仍不愈，经虞和瑞、敖京斯基和纳斯托罗维奇等人商议，决定送我住进医院检查治疗，并请有关方面准予公费医疗。波兰人多信奉天主教，医院护士均为天主教修女，身着黑长袍，头戴白方帽。最初医生怀疑是肠胃病，经肠胃X光透视和摄影以及血液检查等都查不出病因。后来医生责令护士在我夜间正在发烧时采取血样检查，才确诊为隔日疟疾，经服用大量奎宁等抗疟药物即痊愈。事后大家认为在波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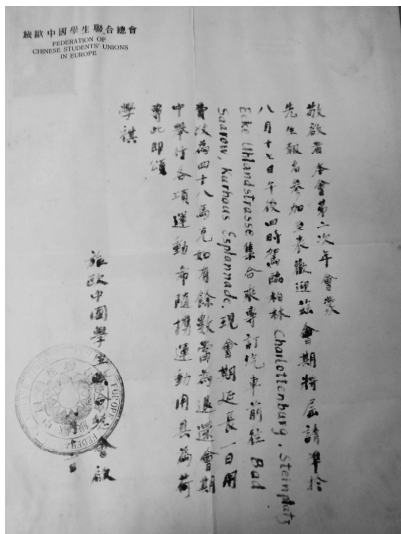


留波期间生病入院的诊治报告

从未有人患过疟疾，我的疟疾肯定是中国带来的。回想我在北平确有过发高烧的经历，可能是因为那时生活饮食正常，服几副中药就好了；到波后水土不服，饮食突变，抵抗力减弱，引起疟疾。我在医院住6~7天后即回宿舍。

我在波留学期间，除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外，还写了三篇文章，报导波兰道路科学技术，投寄国内有关科技杂志上发表，见《秋实录》撰写的学术文章一览中的2、3和4。后来杂志社将杂志寄来几本给我，我即转赠给我的导师和华沙道路研究试验所的几位工程师们，他们表示赞赏并感谢。另外，我还进行过下列学术活动和一系列社会活动。

(1) 1936年3月1日晚接受美国留波学生 Kozuchowski 的邀请，在华沙英语学习班上用英语为该班学员作题为“中国”的报告。



1936年旅欧中国同学会的邀请函



在波留学期间滑雪

(2) 1936年8月16~26日去德国柏林参加旅欧中国留学生联合会第2届年会，出席了当时驻德大使程天放为欢迎年会代表所安排的一次茶会，此外还参观了当时在柏林举办的第11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我感到德国民众有组织、有纪律、社会稳定、国家富强，非常钦佩，但我却未看到希特勒法西斯统治的反动本质。

(3) 1936年5月经虞和瑞的介绍谒见了波兰东方研究所所长兼波

中文化协会理事 Mis Jan 博士，并于 1937 年 6 月 9 日出席该所和协会为欢迎我国新任驻波公使魏宗周所举办的宴会。

(4) 1937 年 5 月去波兰西部名城波兹南参观波兰工业交通博览会，并附带参观该城垃圾处理厂，为期 2 天。

(5) 1937 年 9 月 12~14 日去波兰东南部 Lwow 城(二战后划归苏联)，参加波兰工程师协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并参观了 Drohobycz 市 Polmin 石油勘探与沥青生产基地。

(6) 1937 年 10 月 27 日在华沙参加波兰土木建筑工程师协会年会。

(7) 1937 年 11 月 22 日参加华沙工大教授 Andzej Pszenicki 博士教学科研工作 40 周年的庆祝会。

(8) 1938 年 1 月 3~5 日在华沙工大参加波兰道路与桥梁工程师协会第 4 届代表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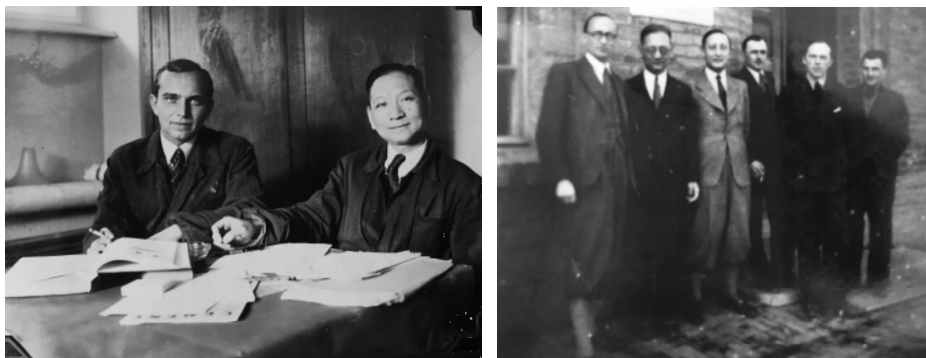
(9) 1938 年 3 月 3 日和 21 日分别出席华沙工大土木系主任 A. Ponikowski 和我的导师 Nestorowicz 在他们家中为我离波回国所举办的饯别晚宴。

(10) 为了准备今后可能有机会进行中波科技文化和工商企业方面的交流活动，有必要在离波之前去波兰各地参观访问，收集有关信息资料。我在 1937 年暑假和 1938 年 3 月两次购得波兰对外国人优惠的廉价旅游火车票各一张，价 60 兹罗提，限定 2 周内 在波兰境内旅游有效。我到过 Krakow、Katowice、Poznan、Gdahsk、Gdgnia、Wilno (二战后划归苏联，改名维尔纽斯)、Krynica、Zakopana、Torun、Czestochowa、Lodz、Lublin、Bydgosce 和 Lwow (二战后划归苏联)。在 Krakow，还参观了该城故宫 Wawel 和郊区的地下盐矿和煤矿，并访问了华沙工大同学 Zbigniew Heplinski 一



1936 年在德国观看第 11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入场券

家。当时 Katowice 所生产的铁路客车车厢以及素有波兰曼彻斯特之称的 Lodz 纺织工业城在全球颇有盛名,出口量很大。此外,波兰的煤炭、木材和岩盐产量也很大,闻名全欧洲。



与波兰友人合影

1937 年冬,我把在波学习情况呈报我国前教育部并请汇发回国旅费,不久即收到该部汇来旅费合国币 800 元(此事在当时上海报纸上曾有报导)。1938 年 5 月,那时抗日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前国民政府已迁到重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决定回国。5 月底我来到柏林,逗留半月,参观高速公路以及柏林工业大学道路试验研究室和试验路,恰好遇见留英学生王德荣,他于 1932—1935 年间曾在清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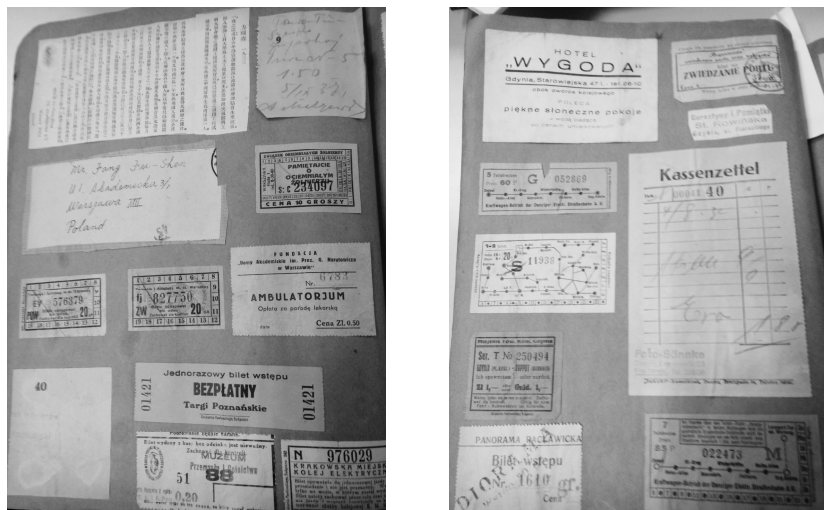
土木系任助教。王偕其夫人也正在准备回国,我就决定同他俩结伴同行。6 月中旬我们一同从柏林乘火车经比利时到达巴黎,又滞留 2 周参观游览并购买车船票。6 月底我们乘火车到法国南部大港马赛,停留 1 天即登上法国 2 万吨级客轮霞飞号,沿着地中海,经过西西里岛至塞得港,再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到达亚丁,然后沿着印度洋经过孟买、科伦坡、仰光、新加坡,到达法属安南(现为越南)的西贡



在回国轮船上留影

市(现改名胡志明市)。停留2天,即乘火车到河内,停1天后继续乘火车经过老街、河口,到达昆明,此时已是7月底了。

这次回国旅行,从西欧到东亚,沿途风平浪静、气候温和,颇觉舒适。只是经过红海时感到奇热,客轮内气温40℃以上,终日汗流浹背,不断淋浴,而且稍觉颠簸。大致而论,欧亚两大洲在地形植被上存在巨大差异,欧洲绿树成荫,土地肥沃;亚洲则岩土裸露,一片黄色。另外,从西贡经河内至昆明的铁路全是1米的窄轨距,其中西贡至河内一段行驶普通列车,有8~9节车厢,车厢短而窄,行驶速度很慢。我们坐的是头等车厢,其舒适程度还不及我国的硬座车。但河内至昆明一段则行驶米其林胶轮列车,只挂2~3节车厢,很像铰接式公共汽车,行驶速度较快,较舒适。该铁路管理不善,海关人员的勒索敲诈与沿途的扒手小偷对旅客造成很大的威胁。我到昆明时,发现只丢失一支德制金质四色活动铅笔和一些日用杂物,已算幸运了。



在波留学期间的部分珍贵纪念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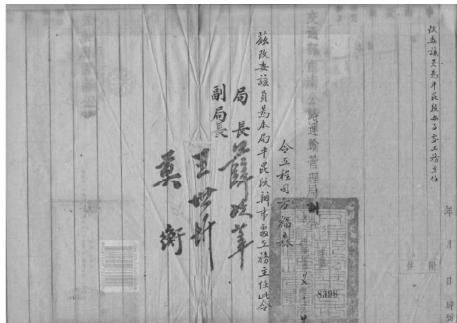


## 05 在昆明与重庆工作

我到昆明时,清华大学也已迁到昆明并同北大、南开合并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我拜访了梅贻琦老校长、工学院院长施嘉炆老师以及土木系各位师长及同学们。那时厦门大学(已迁到福建长汀)校长萨本栋老师来函邀我去该校任土木系主任。我因路途遥远,同时父母亲来信要我等候在昆明完婚,所以就复函萨老师婉言谢绝。后来我认识了西南公路管理局局长薛次莘和副局长王世圻,薛原任上海市工务局科长,1934年曾被派往欧美各国考察公路建设。那时恰巧全国经委会公路顾问敖京斯基任期届满,也拟去欧美各国访问考察后再回波兰。薛遂与敖氏夫妇结伴同行,在旅途中的朝夕相处接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王世圻则是清华老学长又是福建老乡,我通过薛和王进入西南公路管理局任正工程师兼平昆段(平彝至昆明)工

务段长,负责该段公路的维修保养、昆明长途汽车站的建筑施工以及从法国购来的盘山钢桥构件的验收与运输等任务。

1938年9月中旬我五弟福桓同孙江嫒女士自北平出发,经天津乘海轮于9月底抵达上海,停留约20天,他俩又会同孙女



平昆公路段工作聘书

士的四弟孙昌僖三人结伴同乘海轮经香港抵达安南海防港,转乘火车经河内于10月底到达昆明。福桓与昌僖分别进入云南大学土木系和西南联大电机系读书,我和孙江嫫女士于1938年11月在昆明一个饭店里结婚,请施嘉炆老师作证婚人,清华老学姐谢冰心和老学长吴文藻作主婚人。

1939年9月五弟福桓感到云南大学师资较差,设备简陋,无何名望,适唐山交通大学迁至贵州平越县,即离开云南大学转入平越唐山交大继续攻读土木系。当他离开昆明约1个月时,传福桓在贵阳被捕,原因据称是他的云南大学同学方拭持一裤子去洗衣店洗涤,店员发现裤兜内有一“防共和平委员会”的汉奸条子。当方拭去该店取裤时即被昆明保安机关逮捕,方拭说此裤是方福桓临离昆明时存在他处的,昆明保安机关即将方拭释放并通知贵州保安处将福桓逮捕。我听了这消息甚为诧异,认为哪有这样光怪离奇的事情,过了数日,我果然接到平越唐山交大来电称福桓被贵州保安处捕去,当时我也未介意。

又过十多天,保安处突派人来昆明把我也捕去。他们说我和福桓同那汉奸条子有关,并说我俩都是汪精卫部下曾仲鸣之妻方君璧的弟,因为方君璧也是福建人,那时正是汪精卫率领曾仲鸣、方君璧等人自重庆经过昆明、河内、香港等地逃往上海、南京,筹划组织汪伪政权之时。我和福桓被捕后,时至严冬,大兄东在贵阳的好友宁恩承、张训达曾送棉衣等以御寒,我终生难忘。爱人江嫫孤苦伶仃,独守昆明,生活极为困难,靠变卖衣物度日,我精神上也受极大打击。1940年2月,江嫫经过崇山峻岭的长途跋涉,来到贵阳探视我和福桓。这时贵州保安处派人去福建实地调查,证实我与福桓同那汉奸条子无关,而且我家同方君璧毫无关系。这样我和福桓分别于1940年3月和4月被释放,福桓即回平越唐山交大继续读书。后来听说云南省地方当局特意制造此案以便向重庆国民党政府表功。

我和江嫫在贵阳休整约20天后,1940年4月初同去重庆遇见交通部公路总管理处处长赵祖康和帮办(相当于副处长)康时振、肖

庆云。赵祖康于1932—1935年间曾任全国经委会公路处副处长和处长,同当时该处波籍顾问敖京斯基交谊甚笃;康时振于1937年去波兰访问考察公路建设,同我早已认识;肖庆云则是清华老学长。经过他们三人同意,我进入该处计划室任正工程师,协助筹备与重庆大学合办公路试验研究所,拟订公路设计准则和施工技术规程以及公路统计和科学研究等任务。当时计划室主任是清华老学长张昌华,另外,在公路处共事的还有叶廷荣、刘濬业、涂楚平和欧阳昌明等清华同学。

1940年9月至1941年1月,清华同学叶明升任重庆大学土木系主任,他邀请我去该校任兼职教授,讲授道路工程与道路设计。1941年3月至6月,我经成渝公路改善工程处陈本端的介绍去金陵大学电机系附设的汽车专修班兼课,讲授公路工程。1941年4月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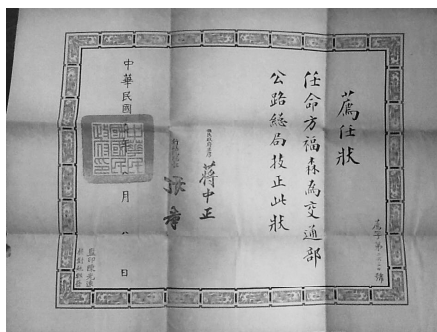


国立重庆大学教授聘书

寇飞机对重庆施加频繁的狂轰滥炸,我家住在重庆上清寺附近租赁的一间小平房内,当日机前来轰炸时即需躲避至附近防空洞内。那时公路总管理处在歌乐山西北廖家店建有职工家属简易宿舍,我因江嫫怀孕,和她商量让她搬往该宿舍居住,每周末我回去探望一次。搬家的第二天我原住的上清寺平房即被日机炸成废墟,我家幸免遭受倾家荡产的灾难。这时江嫫常去歌乐山妇幼保健院作产前检查,我就请孙昌衡三哥写信给该院余琼英医生请她为江嫫接生,结果于1941年10月3日生一男孩,取名庆贤。

1941年9月中央大学正缺道路工程学科的教授,我由清华同学谢家泽的介绍,进入该校土木系任教授,讲授道路工程、高等道路工程、铁路工程、路线测量及土方、道路设计和道路材料试验等课程。1943年9月,那时日机已很少来重庆轰炸,我想将家搬至沙坪坝离

重庆市区较近的地方,但中央大学因条件困难,无法提供家属宿舍,而重庆大学也正缺道路工程学科教授,而且该校能提供家属宿舍,我就决定辞掉中大教职到重庆大学土木系任教授,讲授课程基本上与中大相同,我家也就搬到该校宿舍居住了。当时昆明西南联大因道路工程学科教授李谟焯休假也缺乏教授,该校土木系主任陶葆楷老师也来函请去任教,但我因路途遥远,懒于搬家,即婉言谢绝。那时我虽进入大学任教授,始终未辞去公路总管理处职务,因为那时各地物价高涨,公教人员生活困难,非兼差不足以维持生活。



蒋中正签署的技正委任状

1941年10月交通部公路总管理处改组为运输统制局公路工务处,我仍在该处计划室任正工程师,1942年4月改任督察工程师。1943年1月运输统制局公路工务处又改组为交通部公路总局工务处,计划室改为设计科,我仍在该科工作,4月改任荐任技正;1944年3月兼任该科科长,1945年2月公路总局工务处又改为战时运输管理局工务处,我改在处长室工作,职称改为军简三级技正。同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1946年1月,战时运输管理局又改回为交通部公路总局,4月该局迁到南京,增设技术室,我改在该室工作,任荐任技正,1948年9月改任简任督察工程师,协助制订公路设计标准和施工技术规范以及视察京汤公路沥青路面施工等。1948年底公路总局压缩经费,裁减人员,我主动提出辞呈即



交通部公路总局民国技正证书

被批准。这里补充指出,上述运输统制局和战时运输管理局均隶属军事委员会,但人员的职位和工薪仍沿袭交通部的规定,没有军衔和军队中各种优惠待遇。

在重庆工作时有下列几件事值得一提:

(1) 1940—1941年间公路总管理处一些技术人员发起召开“公路技术座谈会”,每次会均由清华学长、计划室主任张昌华主持,请一人主讲某一专题,然后进行讨论。我曾主讲“公路养护技术”专题,其他还有陈孚华、赵国华、李谟炽、戴居正等人也都被邀请讲述某一专题。座谈会还出版几期《公路技术》刊物。

(2) 1941年底中国工程师学会附设“国父实业计划研究会”来函运输统制局公路工务处,要求派员参加研究孙中山提出的百万英里公路建设计划。该处即派我前往参加,该会给予我一个兼职研究干事名义,我即组织梁健卿、涂楚平二人共同研究并出席该会召开的关于铁路网和公路干线网配合与联系问题的会议共2次。1943年5月写了“国父实业计划中公路建设计划研究概要”一份,内容包括公路干线网的规划原则、公路等级划分、工程进度以及实现该计划所需人员、材料、机具设备数量的估计等。经赵祖康、康时振审阅后交该会。1944年该会将该“概要”汇编入《国父实业计划研究报告集》。



参加“国父实业计划”的证明书

(3) 1942年4月运输统制局公路工务处要求全体人员集体参加国民党,没有介绍人、没有填表、没发党证,也没有任何具体活动,只

是每周一早晨参加“纪念周”，由处长带领全体党员读孙中山遗嘱，然后报告工作情况，有时也请局外附属单位来渝人员汇报工作情况。开始几个月还被迫由工薪内扣交党费，后因物价高涨，生活艰苦，遭到该处人员的反对，即不再扣交。1942年底该处改隶公路总局，我也就自动脱离国民党。

(4) 1942和1943年两年暑假我分别参加了在兰州和桂林召开的中国工程师学会年会。在会上首先由翁文灏会长作会务报告，然后由各专门学会分组讨论并宣读论文，随即利用返程路上参观各地工厂和工地现场并游览名胜古迹。在兰州年会上曾参观西安、成都等地，在桂林年会上参观柳州、贵阳、衡阳等地，此外还宣读了《公路工程技术的演进和研究》论文一篇。

(5) 1943年我加入了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和中国市政工程学会，这些学会都是中国工程师学会内的专门学会，我还被选为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的理事兼会计。

(6) 1943年驻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在重庆设立大使馆，即与我国合组中波文化协会，会长由教育部长陈立夫和波兰大使 Poninski 担任。当时虞和瑞也调回重庆外交部任职，他担任协会总干事，我也加入为会员。在成立大会上，除有不少外交界和文化教育界人士参加外，冯玉祥将军也出席了。该协会还举办了一次波兰古典音乐演奏会，我也参加了，前来聆听欣赏的人士还真不少。1944年秋二战结束，波兰新人民民主政权在华沙建立，驻伦敦的流亡政府被解散，其驻重庆的大使馆自然被撤销，而中波文化协会也自动结束，当时大使馆人员均离开中国，只有一位参赞 Frylin 留在重庆办理善后事宜。1945年6月他托我找一位业余英文打字员协助工作，我先后介绍师大附中同学姚珣闰和公路总局同事钟以庄去担任。

(7) 1944和1945两年教育部曾两次举办选派英美奖学金土木工程科公路学科研究生和实习生的考试，我曾为道路工程课程命题并评阅试卷。与此同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也资助我国选派技

术人员赴美实习,为期1年。经交通部公路总局举办选派考试,我曾为该考试中公路设计课程命题并评阅试卷,结果有20多位人员当选。我还经常办理这些实习人员与国内的联系事宜。

在重庆时我目睹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物价高涨,民不聊生,军队士兵面黄肌瘦。特别是1944年滇、桂前线士兵溃败如山倒,我感叹这样哪能击败日寇。此前太平洋战争爆发,我觉得英、美必将战胜日本,信心大增。到1945年果然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大小官员争先恐后回到南京、上海一带,那时我也很想离开重庆大学,随公路总局复员南京。

## 06 在上海和南京工作

1946年4月间,前中央大学土木系主任康时振突然来找我说,行政院将设立“工程计划团”,以接待美国 Morrison - Knudson 工程公司的专家、顾问,共同研究我国铁路、公路战后维修、恢复和改善工程计划。康还说已辞去中央大学土木系主任职务去“工程计划团”负责公路方面工作,希望我也能去协助,我当即表示同意。不久该团即函请公路总局借调我和吴必治两人去协助工作并给以工程师的职称。吴当时是公路总局技术室主任。公路方面还有陆筱丹也在该团工作,陆原也是公路总局工务处工程师,1945年春被选派赴美实习,翌年春回国即来该团工作。

1946年5月我携江姝和大儿庆贤乘飞机来到上海向该团报到,见到该团团长茅以升、公路组长康时振以及美国 Morrison - Knudson 工程公司派来的公路专家、顾问 Harry Hart 和 Lewis Roberts 等人。同年6月,我、吴必治、陆筱丹三人陪同2位美籍专家视察了西南、西北公路。我们先乘飞机到武汉后转火车到长沙,从长沙开始视察公路,乘中型吉普经衡阳、贵阳、重庆、成都到西安,7月结束,乘飞机回到上海。8月中旬,我写了一份视察报告,内容包括沿路线形、路基、路面、桥涵等结构物损坏情况及其整修意见,交康时振组长阅后未作任何处理。8月间美籍专家回美,公路组即告结束,我和吴必治仍回南京公路总局技术室工作,江姝携庆贤儿



去北平岳父家探望并休憩。

1946年7月我曾经清华同学刘光文、谢家泽的介绍加入了“华社”，该社是清华土木系1934级部分同学临近毕业时发起组织的，后来也吸收其他大学一些毕业生参加。该社是联谊性质，类似于兄弟会。该社办有一个名为《华光》的不定期刊物，报导社友的生活工作情况和通信地址等。1947年夏，上海和南京两地校友曾在上海华仪工程贸易行开过一次年会，时间一天，上午开会，下午去虹口公园游玩，晚上聚餐。南京社友偶有聚会，大多是在外地社友来南京时表示欢迎以增进友谊，聚会大多在陈永龄或夏坚白家或餐馆里举行。该社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自动解散。

1946年8月正是清华老学长吴有训和沙玉清分别担任中央大学校长和土木系主任，他们都欢迎我回该校任教。我就应聘为土木系教授，讲授道路经济与管理、路线测量及土方、铁路工程、给水工程和下水工程等课程。那时萨本栋老师也在南京中央研究院任职。1946年10月间有一天，吴校长在寓所设家宴请萨本栋老师、沙玉清主任和梁治明学兄，我也应邀参加。如前所述，这时我并未辞去公路总局技术室荐任技正职务。同年9月前中央训练团复员军人转业交通训练班函请公路总局派员去该班兼课，讲授公路工程，每周2小时，该局即派我去讲授。到10月底我因中央大学和公路总局两方面任务已很繁重，不能再去兼课，我就介绍公路总局同事龚一波去接替。此外，我在1945—1947年间，曾三度任前考试院高等考试土木科襄事委员，为公路工程和铁路工程两学科命题并评阅试卷。

1947年公路总局第一机械筑路总队第三、四工程队首次采用机械铺筑南京至汤山长28公里的沥青表面处治路面，采用美商德士古地沥青，针入度为40~50，因太稠硬，掺入10%~20%的柴油予以稀释，沥青用量为4~6千克/平方米，用拖挂式沥青洒布车进行喷洒。当时有澳大利亚籍技术顾问D. S. Lawrence指导施工。我曾多次陪同他去工地现场视察指导。同年4月江媵携庆贤儿在北平探亲休憩完毕回到南京，不久，中央大学丁家桥青石村教师宿舍修筑竣工，我

家即被分配在该宿舍居住。我的女儿珩和次子宁贤分别于 1948 年 6 月 21 日与 1949 年 11 月 11 日出生,均住中央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由该院医生、江嫫中学同学刘天香接生。

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政府大小官员去各地接收政权,大发国难财,成为“劫收大员”,加之物价猛涨,民不聊生;而美军到处横行霸道,耀武扬威,几乎把我国视为殖民地。1948 年底李宗仁代理总统,张治中去北平进行国共和谈,当时我很希望和谈能成功。1949 年初国民党政府机关和官员开始纷纷撤离南京,我想如果跟他们走,那是自讨苦吃,没有前途;共产党来,总还是要进行建设,要办大学,要教授教书的,所以我决定不离开南京,等待解放。

## 07 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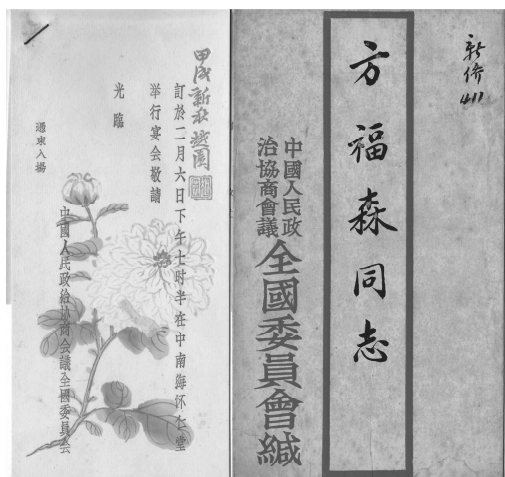
1949年4月南京解放,我目睹人民解放军的高度组织纪律性和艰苦朴素的作风,使我非常感动和敬佩。同年10月,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奉命改名为南京大学,其组织内容基本不变,我仍任该校土木系教授,所授课程与前大致相同。1949年底,我经梁希、周慧民的介绍加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1950年4月南京军区空军指挥部请我为该部技术人员讲授“机场跑道工程”约6小时。那时清华土木系道路工程学科教授李谟焯离校,该系主任陶葆楷老师来函邀请我回清华母校任教;同时燕京大学土木系李德滋和杨曾艺两教授也来函邀请去该校任教,我都因懒于移动搬家婉言谢绝。1950年8月我家被分配到碑亭巷板桥新村南京大学教师宿舍居住。后来我经徐百川介绍加入中国教育工会。10月南大工学院举办展览会,土木系向金陵大学借来美国筑路机械电影片,在南大礼堂放映,由我讲解。1951年春我经于铎的介绍加入江苏省科学普及协会,后又加入中苏友好协会。

1951年4月和9月我分别为南京人民广播电台科普节目播讲“城市道路”与“桥梁”两个专题,每次约20分钟。同年6月中央交通部干部学校南京分校请我去兼课,讲授道路工程和桥涵工程。1952年5月结束。1952年2~6月参加思想改造运动。7月全国高等学校酝酿院系调整,南京大学土木系拟分为结构和路工两系,后因故

未能实现。8月开始招收工民建、道路和桥梁与隧道三个4年制专业以及工民建、道路和测量三个2年制专修科学生。9月开始学习苏联教学先进经验,并试拟道路专业教学计划。当时我认为苏联教学制度计划性强,专业目标明确,重视生产实际,确实较之欧美制度为优越,我还在《人民南工》刊物上写文章鼓吹宣传。

1952年10月全国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以南京大学工学院为基础,并入金陵大学、安徽大学、厦门大学和江南大学等有关工学科系,在原中央大学校本部校址,建立了南京工学院。11月清华大学土木系主任陶葆楷来信请我到母校任教,我因懒于搬家,再次婉言谢绝。同年12月至1953年2月,我和金宝桢被派往参加南工第一届俄文突击学习班学习;2月审查中国科学院寄来的《铁路、公路名词解释草稿》;3月参加南工第二届突击学习班的辅导工作;4月中央交通部来人了解公路教学情况;1953年5月土木系设置结构、施工、道路、测量和材料五个教研组,我任道路教研组主任,讲授道路工程、道路建筑、道路设计等课程。后来原属道路教研组的道路材料试验室并入材料教研组。我对学校开办道路专业积极性很高,认为这是党和国家的需要,也是对我个人的信任和培养,决心要办好。1953年7月,我在南京指导公路专修科学生进行专业认识实习,同年8月参加南京市道路系统讨论会。1954年1月去上海参加高教部在同济大学召开的土建类专业四年制本科和两年制专科教学计划制定会,高教部副部长曾昭抡和苏联专家 САДОВИЦ 莅临指导。6~7月我带领该班学生去福州、南平等地进行毕业生产实习。1955年7月我带领本科二年级及专修科一年级学生去上海进行认识实习。

1955年9月南工道路专业开始招收五年制本科生,其中有5名越南留学生;同时停止招收四年制本科和二年制专修科学生。11月道路专业接受成都工学院派来毕业生6名和福建省派来工程师1名来进修学习。1956年春,我首次指导本科四年级和专修科二年级学生的毕业设计;同年3月交通部拟在北京东郊管庄建立全国第一所



1956年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请帖

公路学院,我两次被派往参加该学院的筹备委员会;4月我被评聘为二级教授;6月我同闻德荪去上海同济大学向苏联专家诺西奇咨询建立公路学院的有关问题;9月道路专业招收第一名研究生邵启胜;10月南工首次举行科学报告会,我提交并宣读《中国道路建筑发展史》论文。1957年7月我同金宝桢去武汉看望正在该地进行毕业实习的学生。1953—1957年间我曾任南京工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1955年12月道路教研组曾被评为全院先进集体

徐吉谦被评为青年积极分子。1956年1月毛主席来南京在市委大院接见工商界和知识分子代表,我被通知前往参加;接着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

解放前我对共产党没有接触,不了解,不认识。解放后在党的教育与培养下,通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思想改造、三反五反一系列政治运动以及日常政治学习,逐步认识到共产党是为解放全中国、全人类的,是真正为人类谋幸福的,有崇高的理想、可贵的道德品质和艰苦奋斗、大公无私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同时党大力推进建设事业,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都取得伟大胜利;武汉长江大桥即将完工,长春汽车制造厂已生产汽车,各地石油工业快速发展;而且外交、文教、卫生各条战线也在大跃进;市场繁荣,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我国从来也没有像这样团结统一的局面,全国人民无不为之欢欣鼓舞。我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建成富强的国家,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是最光荣和先进的,所以我开始有入党意愿。

那时教研组党员徐吉谦、闻德荪也经常和我谈到关于新社会如

何美好,旧社会如何黑暗腐败等问题。他俩还送我一本《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我读后初步获得一些党的知识。1955年底鲍有逊和陈东在板桥新村金宝桢家召集几位老教授讨论有关建党问题,我大兄东对于我入党也从侧面做了些促进工作,这样我就于1956年2月写了入党申请书并填写有关表格交党支部,介绍人是陈东和孙祖述。2月29日党支部开会讨论获通过。后来我经常参加党支部的组织生活,有时也参加系党总支的组织生活,内容为时事政治学习和思想工作汇报等。1957年4月我写了“入党转正思想检查报告”,在一次支部生活会上讨论我的转正问题,同年5月10日在党总支会上讨论通过了我的转正申请。

1957年我接受波兰高教部的邀请,赴波进行为期2个月的访问、考察和讲学。10月初我去北京办理出国手续,领取护照和签证并注射防疫针。9日晨9时搭乘一架有20多座位的小型客机,11时抵达蒙古国的赛音山达,稍停续飞,午后1时抵伊尔库茨克,经苏联边防站和海关检查后,换乘TY-104大型客机,于当地时间晚7时抵达鄂木斯克。稍停续飞至晚11时抵达莫斯科,在机场招待所卧憩3小时后换乘小型飞机于当地时间翌日凌晨7时抵达华沙,当即由我国驻波大使馆和波兰高教部人员接到一宾馆居住,波高教部把接待我的任务交给华沙工大,该校即派道路与飞机场教研室主任S. Lenczewski和建筑材料科学与工程系主任W. Skalmowski并商请建筑科学研究所所长A. Kobylinski三位教授负责接待。他们在1936—1938年我在波留学时都是华沙工大的讲师或助教并兼任华沙道路试验研究所的副所长、室主任或研究员,并都辅导过我。后来我出席了华沙工大教授们为我安排的一次欢迎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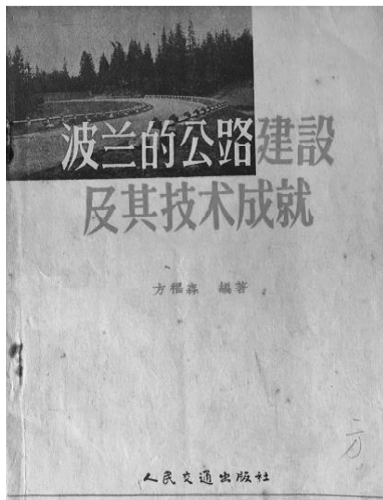
10月中旬我由S. Lenczewski陪同乘飞机去克拉科夫,由克拉科夫工大校长兼土木系主任K. Sokalski陪同乘汽车去伏罗茨瓦夫,再由伏罗茨瓦夫工大道路教研室主任Jan Rozycki(1936年我在华沙至Modlyn公路上水泥砼路面工地实习时,他是该路的主任工程师)陪同,乘汽车到波兹南,又由波兹南工大道路教研室主任

W. Stefanski陪同,乘汽车来到格但斯克,会见了格但斯克工大道路教研室主任 B. Gebhard,并拜访了敖京斯基夫人(二战后敖氏曾任格但斯克市市长,约于1954年去世)。11月中旬 S. Lenczewski 专程来到格但斯克,迎接我乘高速火车回到华沙,总计在公路上行程约4 000公里。

在旅途中我除考察公路建设外,每到一地都停留数天参观该地工业大学,特别是公路、城市道路及飞机场专业教研室以及筑路材料、机械和土工试验室,了解专业教学计划、课程教学大纲和毕业设计情况,并聆听1~2节道路工程讲课。此外,还参观访问了一些公路建设单位和科学研究机构,其中包括波兰建筑科学研究院、道路建筑科学研究院、铁道技术研究院以及华沙、克拉科夫和波兹南三个公路试验所,斯撒林(Strzelin)和格拉柴(Gracze)两个采石场,扎雷(Zary)、克劳斯诺(Krausno)和波茨克(Plock)三个养路工区,克拉科夫和伏罗茨瓦夫两个筑路机械厂、俄维奇(Lowicz)装配式砼试验路面和水泥稳定土试验基层、波兰西部和北部高速公路以及华沙 Zeran 汽车制造厂等。在克拉科夫时,我被当地公路管理局邀请参加道路界的道路科技会议。回华沙后我参加了华沙工大土力学教授 Pietkowski 的国家博士学位的论文答辩和典礼仪式;为我的博士生导师 M. Nestorowicz 凭吊扫墓(他于二战初期去世);并在波兰道路建筑科学院用波文做了一次“中国的公路建设”的学术报告。最后我受到了波兰交通部副部长的接见,该部聘请我担任道路建筑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荣誉学术委员,并举行庆祝仪式。

1957年11月27日我离波回国,先由华沙乘飞机到达莫斯科,逗留3天,由在莫斯科公路学院学习的研究生梅安金陪同访问了该院,会见了著名的路面工程教授 Н. Н. Ибахов,参观了专业试验室,了解了教学计划和毕业设计;后又接受在该院学习筑路机械的研究生孙祖望(90年代初孙是西安公路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的约请,为在该院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作了一次赴波访问和当时我国公路教学与科研情况的报告。此外,还参观了全苏道路科学研究院

及其在莫斯科的试验基地。后又由在苏进修的哈尔滨建工学院土木系主任李德滋陪同参观了莫斯科工业博览会和莫斯科大学的夜景。11月30日我乘飞机离莫斯科回国。后即写了《波兰的公路建设及其技术成就》。还写了《赴波兰访问工作报告》，油印后分送高教部、南京工学院和我国驻波大使馆各1份。



《波兰的公路建设及其技术成就》封面

1958年底莫斯科公路学院来函邀请我去出席该院为庆祝 H. H. ИВАНОВ 教授 70 华诞所举行的科学报告会,我未能去参加,只写了一封祝

寿信请南京工学院院长办公室寄去。1960年9月华沙工大寄来博士研究生 J. Szacillo(1936年我在华沙至 Modlyn 公路上实习水泥砼路面时他是该路工程师)的学位论文《装配式砼和钢筋砼路面的试验研究》,请我审查并提意见,我审查好将意见送学校转高教部寄回华沙工大。其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同国外友人就没有相互通过信和贺年片,只有 A. Kobylinski 一人每年还给我寄来贺年片,直至1967年为止。另外还有 W. Skalmowski 于1970年前后寄给我一份他所写的《二次大战前华沙道路试验研究所回忆录》。至于波兰

《道路》月刊,在1965年以前每年12期我基本上都收到,1966年收到9本,1967年收到4本,1968年收到3本,以后均未收到;《波兰道路建筑科学研究院论文报告集》1967年以前每年4本基本上都收到,1968年只收到1本,以后就没有收到了。



波兰友人的明信片



1952—1962年间每年新生入学都由我做专业介绍,很受同学们的欢迎和鼓舞。1958年4月我同南工几位教师去松江、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地为高中毕业生宣传专业。同年爆发了“教育大革命”,道路专业师生共同组织道路公司,去大厂镇进行生产施工和现场教学;还大搞勤工俭学和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与结合实际的科学研究;还通过师生结合方式编写《道路养护》教材。1959年我同几位教师率领道路专业四年级同学去北京参加钓鱼台国宾馆施工劳动。1960年我在指导道路专业五年级学生(其中包括越南留学生)的毕业设计时,结合实际选择南京城西干道和长江大桥引道互通式立交设计的专题。1961年我开始结合路面科学研究,指导五年级学生的毕业论文;其后每年,我都选几位五年级学生进行这方面的毕业论文,例如1963年有陈荣生、戴经梁等,1964年有沈金安、闵长龙、熊广忠、朱铨等。1960年6月原属砗材料与构件教研组的石料和沥青材料两个试验室转移并入道路教研组。同年10月我家迁到兰园28号教师宿舍居住。

50年代初我即开始患胃病,初时很轻微,后来逐渐加重。1958年暑假组织上曾安排我去无锡工人疗养院疗养半月,效果不显著,同年9~10月和1959年9月我两次住进鼓楼医院,诊断为胃及十二指肠溃疡。后来大量呕吐,大便呈黑色沥青状。1961年10月我又两次住进工人医院医治,经保守治疗不见效果,1962年2月我决定在工人医院动手术,在手术过程中检查消化道系统时,医师发现我除有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和缩窄外,胆囊还有大块结石。经家属同意后,医师决定切除胃的3/4和胆囊全部。但在手术后的第3天,我又发高烧,体温达39.5℃,两眼出现黄色,经X光透视造影查不出病因,后来经验血医师确诊为黄疸性肝炎,疑是在手术输血过程中输入带肝炎病毒的血所致,经打针服药后逐渐痊愈。4月底我出院回家休养,我多年宿疾从此被医好,是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但因是大手术,我仍感到元气大伤,体力大不如前。系里决定免除我道路教研组主任职务,由方左英继任。此后我主要负责指导毕业论文,

进行科学研究和指导研究生的学习任务,教学任务就减少了。

1962年系和教研组安排邓学钧做我的科研工作助手并重点培养青年教师,1963年9月道路专业招进第二名研究生王凯。我本来准备在1963年暑假后讲授路基设计课程,并事先备好了讲稿及笔记,但在上第一堂课时在课堂上晕倒,我不得不将讲稿及笔记交予助教任福田,请其继续代我讲授。1963年10月院举办教学展览会,系和教研组把我所写的《路基设计》讲稿及笔记拿到会上展览,受到表彰;11月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在一次全系教职工大会上做了“摆事实,新旧对比,忆旧大学苦”的发言。1964年3月系给我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1964年9月至1965年8月系给我休假1年,以便把身体养好,但我想到党已把我从胃、胆病魔中拯救出来,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应更好地工作以报答党,所以我仍然未间断工作。1965年5月我去天津指导道路专业五年级学生进行“水泥砼路面调查研究”的科研毕业论文。1966年5月我去上海指导道路专业五年级学生“用弯沉仪测验柔性路面强度”的科研毕业论文。

## 08 “文化大革命”中

1966年4月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批判“三家村”，我以为这只是纯学术的批判，主要是针对意识形态方面的，如文学、美术、戏剧等，与理工科关系不大。6月间在抄“四旧”运动中，我被抄走一些在旧政府机关工作的派令文件、旧笔记、旧照片、旧唱片和旧字画、衣物等，接着就进行减发工资、压缩住房运动，我对这些还没有引起较大的思想抵触情绪，因为很多教授都一样，但后来我对于一些访问波兰时所摄的旧照片和笔记等有些恋恋不舍，认为这只是一般性纪念物品，不属“四旧”的范畴。8月被勒令靠边，停止党的组织生活活动，并与教研组老教授组成一个学习班，抄写和观看大字报。12月我被通知去五五楼参加接待外地来宁大串联红卫兵的住宿工作。1967年5~10月我除有病请假数日外，每天都到教研组学习、开会、抄写和观看大字报。8月南京发生武斗，我在兰园宿舍参加1~2次宿舍保卫工作。

1967年11~12月我被通知参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班”学习，1968年1月我被勒令每天去南工医院参加扫除垃圾劳动，3月改为每天上午去教研组学习，下午仍去南工医院扫除垃圾。在扫除垃圾过程中，需将垃圾铲入手推车内，然后将车推到学院东门内左侧垃圾站卸下。医院距离垃圾站约300米，在推车过程中偶尔有街道儿童向我投掷石块，并喊叫“五类分子”。3月的一天，

土木系三年级学生为了进行“复课闹革命”运动,从我处借去 100 元钱,约 1 年后偿还。8 月起又改为每天上午参加大礼堂及学校周围墙壁整修粉刷劳动,下午仍去医院扫除垃圾。1968 年 11 月我被通知参加“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学习。1969 年 3 月 18~23 日在道路与基础片参加学习,24~28 日去老教师学习班学习,29 日参加教授学习班学习。5 月 20 日去南京东郊湖山煤矿劳动并参加整党运动。7 月 6 日又回教研组学习并劳动。8 月 6 日去系图书室整理图书资料。12 月 17 日又被通知去南京南郊板桥 476 厂参加工地劳动,28 日回系参加战备图书资料的整理及装箱工作。1970 年 2 月又被通知去板桥 9424 工地参加劳动,7 月又回系图书室整理图书资料。1970 年 10 月至 1971 年 7 月参加清查“5·16”分子运动,1971 年 3~4 月间我被通知每隔一夜值班看守“5·16”分子。

1971 年 8 月开始学习中央 44 号文件,即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1971 年 10 月 4 日至 1972 年 1 月 11 日与胡文龙、顾尚华等去皖南大别山区进行公路勘测劳动并草拟三年半制的工农兵学员的教学计划和课程教学大纲。1972 年 3 月我被通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9 月道路工程专业招收第一批三年半学制的工农兵学员,系宣布道路教研组主任由庄海涛担任,我和方左英为副主任。1973 年 12 月 28 日晚我为同济大学道路专业工农兵学员讲授“水泥砼路面设计”专题。1974 年 7 月 3~7 日与胡文龙去上海联系 1972 级工农兵学员现场教学事务。1975 年 6 月 19 日与曹侃去中央门外沥青热拌厂座谈提高沥青混合料热拌机生产力问题,9 月参加校党员干部学习班学习。之后在一次体格检查中发现我颈部右侧有一直径 2 厘米的甲状腺肿块,医嘱须进一步观察,我未介意,至今无何感觉,遂任其自然。1976 年 6 月我患前列腺炎,医师疑是恶性肿瘤,遂两次住进鼓楼医院,原拟动手术,后因唐山大地震,迟迟未进行,后来医师又排除恶性肿瘤,让我长期注意观察,至今除前列腺肥大、小便变细而慢外,并无其他感觉,也就听其自然。

## 09 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后

1976年中央宣布结束文化大革命,继而进行拨乱反正,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全国形势一片大好,文化、科技、教育各方面迎来了美好的春天。从1976年到1987我退休前的11年间,我的工作比较繁忙,负担很重,主要是培养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编写教材、制订教学计划和课程教学大纲、撰写和翻译科技论文,参加华东公路科技情报网、编辑《华东公路》月刊,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土木工程卷



1977年参加江苏省第六次党代会代表证

和交通卷的编审工作,审查其他单位和个人编写的书稿、论文,以及出席有关专业的科技学术会议。另外还出席清华母校校友会的聚会并接待一些从海外回国探亲、旅游、参观、访问、讲学的老同学、老同事和亲属朋友等。

从1976—1987年这11年间,我共培养了钱国超、黄卫、朱中贤、赵建春、张云龙和谈理者六位硕士研究生。1983—1984年间我为同济大学道路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汪光焘、周继业和黄保和评审论文,1986年为西安公路学院公路系硕士研究生侯印华评审论文。

1977年全国高等院校,包括南京工学院各系、专业都停止招收工农兵学员,恢复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改为4年。只有南京工学院道路工程专业决定停止招生一年,原因是奉教育部命南京工学院道路工程专业要招收外国留学生,停止招生一年就是为了要扩建实验室、修订教学计划和各课程教学大纲、编写教材等一系列准备工作。尽管交通部公路局伍坤山局长表示反对,并于1977年7月邀请几所有关高等院校代表参加在兰州召开的全国公路基本建设会议进行协商讨论,但未有效果,至1978年9月才开始恢复招生。在新生中有亚洲、非洲外国留学生10名,其后又于1980和1983两年分别招收4名和2名。1981年1月22日我还与78级外国留学生座谈专业学习问题。1985年南京工学院道路工程专业接受了原在该专业毕业的尼泊尔留学生马拉为访问学者进修桥梁工程,决定由我做指导老师。

1978年4月,我同胡乾善、黄伟康、万德钧、刘士中、周荣祥等去北京为南京工学院图书馆选订外文图书期刊资料,同年8月2日在五四楼参加交通部委托南京工学院办理的公路勘测设计培训班结业典礼。



参加中国公路学会成立大会合影(一排左五为方福森)

## 10 退休以后

随着国家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扩大和深入,我们学校、院、系、专业组织也有较大的变革和调整。首先是在1987年土木系增设交通工程专业。同时,为了更好地开展道路、桥梁与交通工程的科学研究,还成立了运输工程研究所。1988年经国家教委批准,南京工学院改名为东南大学。1989年底学校决定将道路工程、交通工程和环境工程三专业和运输工程研究所由土木工程系分出建立交通运输工程系,并与运输工程研究所实行系所合一的体制。1995年1月学校决定将交通运输工程系升格为交通学院,运输工程研究所也随着成为交通学院的一个组成部分。1997年10月土木工程系升格为土木学院,环境工程专业又从交通学院移入土木学院。

1987年3月我和全校的一些年老的教师都办了退休手续,1988年4月参加退休教授协会。我光荣退休后,除了继续进行一些教学、科研、文章写作和培养研究生方面未完成的扫尾工作而外,还出席参加了我所学习和工作过的清华、北洋、北师大附中、中央大学、南京工学院和东南大学等学校校友会的聚会活动,并接待了不少从海外回国探亲、旅游、参观、访问、讲学的老同学、同事、朋友和亲属。此外还进行了一些其他值得怀念的事情。

培养研究生方面,我于1989年7月完成了符冠华、华永红、张晓冰、茅梅芬四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任务;后来又于1990年6月完成

了黄晓明、唐伯明两位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任务,参加了两研究生的论文答辩会,由朱照宏任主任委员,丁大钧、侯国器、宋启根任委员。另外,我于1987年8月还为同济大学材料科学系博士研究生张滨生评审论文并任答辩委员会委员;1988年5月为南京工学院道路工程专业硕士生李树光评审论文;1995年1月在逸夫科技馆为东南大学道路工程专业博士生黄卫、倪富健任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王秉刚任主任委员,其他答辩委员有曹吴淳、李洪林、邓学钧和陈荣生;1996年5月还为东南大学道路工程专业博士生周虎鑫、杨军的学位论文审校英文摘要,他们的论文题目分别为《机场砼道面的翘曲应力》和《格栅加筋沥青砼路面》。



应小儿子邀请去香港旅游时合影

在学术文章写作方面,我写了:①《水泥砼路面修筑技术发展前景》;②《我国水泥砼发展前景》;③《论江苏省公路交通综合治理》;④《沥青路面设计方法的发展》(与黄卫、顾维平合写)等4篇。此外,我曾于1993年11~12月间曾同老伴去香港探亲旅游观光,回南京后写了:①《香港的城市交通》;②《香港的交通运输》;③《香港的道路交通运输》3篇文章。为了表达对过去读书、学习和工作怀念之情,1994年我还撰写了《毕业六十周年述怀》和《在北京师大附中读书时的回忆》两篇文章。1996年我还编写了《东南大学道路工程专业发展简史》。1996年6月21日我应交通学院本科毕业生代表3人的请求,题写了一个“才兴交院”的匾额赠送给学院;同时还为4名交通工程系毕业生题写临别赠言,激励他们成材。1997年8月23日我应蒋永生的请求,题写一个贺词,祝贺东南大学土木学院成立。10月15日我还去原土木系门前参加了该学院成立大会,到会的还有陈笃信、陈万年、朱万福、唐念慈、林醒山、徐百川、鲍恩湛、丁大钧、张



寿庠等。

在外文图书专著翻译方面,1987年我曾和陈炳麟、陈连汉合作翻译美国各州公路与运输工作者协会出版的《公路与城市道路几何设计》一书,译稿交人民交通出版社,后因故未能出版。1990年我又与邓学钧、黄卫、钱国超合作翻译 Haas C. G. Ralph 所著《路面管理系统》一书,后也因故未能出版,译稿存黄卫处。

我退休以后还为其他个人和单位审校书稿共3项:(1)江苏省交通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江苏公路交通史》;(2)南京市公路管理处史志编委员会编写的《南京近代公路史》;(3)邓学钧、陈荣生合编的《刚性路面设计》。此外,我还为国家教委审查各高校申报科技进步奖的科研成果报告共3项,即西安公路学院于1988年报送的“石灰稳定土原理及应用”以及同济大学于1989年报送的“半刚性基层沥青路面的研究”和“无锡市交通规划模式和模型研究”。1995年5月我还接受交通学院的委托,审定教师为申报交通部优秀教材奖所报送的教材共2种,即王秉刚、邓学钧合编的《路面力学数值计算》和徐吉谦主编的《交通工程总论》。我还为其他单位技术人员申请提升职称评审所报论文计有:江苏省交通厅钱梅贞于1987年提升为高级工程师以及南京交通高等专科学校龚一波于1996年提升为成绩优异的高级工程师。

1991年8月中我应南京空军后勤部的约请为福建民航支援吉里巴斯班利(Kiripafic Borric)飞机场修建合同稿进行勘误校正。1995年6月又应俞建荣的请求,校正其与金志强合写的《水泥砼在路面工程中的应用》论文英文稿。1996年7~8月间我还应北京军区空军勘察设计院齐诚和东南大学黄晓明的请求,审校其所提交的国际会议的英文论文稿。前者题名为《20厘米厚机场道面不设胀缝的试验研究》,为齐诚与北京市政工程设计院梁建宁合写;后者题名为《机场砼道面的加铺层》,为黄晓明与齐诚合写。此外,1991年我还为东南大学交通运输工程系张云龙、魏文斌和俞建荣去美国留学写推荐信以及为福建省交通厅陈国华去日本留学写推荐信。



参加《道路工程技术词典》审定会时合影(一排左九为方福森)

我退休后所出席参加的全国性学术会议计有：1987年在合肥召开的振压水泥砼路面鉴定会和在南京召开的重载交通荷载下的水泥砼空心板路面鉴定会；1988年在河北唐山召开的水泥砼路面科研讨论会；1989年在西安公路学院召开的该院申请博士学位授予权点论证会以及1991年在南京召开的水泥砼路面发展政策研讨会等。此外，我还参加江苏省和南京市有关单位召开的学术会议，其中有：1987年在扬州召开的省交通运输协会理事会和在南京召开的省水泥砼路面磨耗及钢纤维砼路面研究会；1988年在南京召开的两次《南京近代公路史》审定会、《江苏省公路交通史》审定会和江苏省公路学会常务理事会；1989年在南京召开的省交通科技政策论证会和省公路学会换届理事会；1990年3月底在南京召开的省公路学会常务理事会，以及1991年在南京召开的大校场机场道面加固工程验收会。1990年4月中我还参加了东大土木系召开的编辑系史讨论会，到会的有徐百川、林醒山、方左英、孙云雁、张寿庠、姚琰等人。1996年6月初我去逸夫科技楼参加东南大学交通学院召开的座谈会，讨论学院如何协助学校申请“211”工程问题，到会的有盛昭瀚、陈荣

生、方左英、徐吉谦、黄卫、王伟等人。



参加南京大校场机场竣工验收会时合影(前排右三为方福森)

我退休后还于 1987 年接待外国专家学者两次：一为美国肯塔基大学工学院院长、美籍华人高德瑜教授，另一次是美国海华市交通工程师美籍华人张秋(已退休)，他被南京工学院授予客座教授称号。

我退休后曾两次接待外单位来人咨询有关学术问题：一是在 1989 年 8 月初新华日报记者王强来咨询“马路”的涵义；另一次是 1990 年 8 月底上海市政工程研究所和华东市政工程设计院等单位联合派来 4 人咨询我国当前修建高速公路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问题。1994 年 9 月中我还将所珍藏多年的南京城市建设资料共 24 份赠送给南京市城市建设档案馆，获得该馆颁发的奖状。

关于我服务工作达五十六年之久的东南大学校友聚会活动情况：首先是在 1990 年 10 月初该校前身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和南京工学院土木系道路工程专业毕业校友返校在土木系大会议室聚会庆祝建校 88 周年，到会约 100 人，其中有杜修春、姚禹谟、何肇腾、钱绍武、程景颐、蒋友林等人。在开幕式上朱万福、陈荣生、徐百川、方左英和我都讲了话，后在大礼堂前合影留念。在闭幕式上有王荣年、

苏华钦和校友代表 3 人讲话,最后在校东第二招待所餐厅聚餐。会后我还为“东大交通运输工程系公路与城市道路专业校友通讯录”题词。随后就是在 1992 年 1 月下旬参加了在东大大礼堂后面演讲厅召开的前中央大学校友会茶话会,会上主要有李汝骅汇报去香港和台北举办画展及参观台湾“中央大学”情况。到会的有钱钟韩、时均、范从振、徐镛、舒光冀、徐百川、陈昌贤、管致中、王荣年、林醒山、张寿庠、史维祺等人。1992 年 6 月初又同徐百川、方左英、王惠英、孙云雁等去大礼堂参加东南大学建校 90 周年纪念会;后又同吴伯修、范从振等人参加在大礼堂二楼会议室举行的前中大校长顾毓琇 90 华诞庆祝会。1993 年 10 月 9 日与方左英去交通运输系大会议室参加南京工学院道路工程专业 63 届毕业生返校庆祝毕业 30 周年纪念会,到会的有王荣年、陈荣生、戴经梁、郭文复、黄彭、盛安连、蔡龙章等人,会后在大礼堂前合影留念,晚间在外国留学生楼餐厅聚餐。1994 年 5 月 4 日又与方左英去交通运输系大会议室参加南工道路工程专业 64 届毕业生返校庆祝毕业 30 周年纪念会,唐念慈、李奉吉等前来参加,到会的还有杜永年、沈金安、闵江、邵树德、顾子刚、孙锦祥、陈明生、包秀祥、刘志海、朱云初等人,会后在大礼堂前合影留念,并去榴园宾馆聚餐。我还为该届毕业校友通讯录题词。1995 年 6 月 9 日与方左英到大礼堂参加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成立大会,遇林醒山、高良润、林挺泉等人;10 月 1 日与方左英去参加 1985 届道路专业毕业生返校庆祝毕业 10 周年纪念会,到会的有杨涛、刘小明等约 30 人,在大礼堂前合影留念,后在榴园宾馆午餐并讲话;10 月 31 日又参加 75 届道路专业毕业生返校庆祝毕业 20 周年纪念会,到会的有李平楨、苏华云、俞明德、文福明等约 30 人,在大礼堂前合影留念,后在榴园宾馆聚餐,我还为该届毕业校友通讯录题词。1995 年 11 月 16 日去逸夫科技楼参加中央大学工学院南京校友联谊会,到会的有方左英、张书农、唐念慈、周鸮、王荣年、史维祺等人,并在楼门前合影留念。1996 年 9 月 30 日参加 1986 届道路专业毕业生返校庆祝毕业 10 周年纪念会,到会的有陈荣生、邓学钧、陈雅贞、高

辉、胡文龙和徐吉谦等人,在大礼堂前由我和方左英讲话后摄影留念,后去榴园宾馆聚餐。1997年5月上旬应东大福建校友会和福州校友会的邀请,我和老伴随同东大毛恒才副校长和李芳芳、楼高潮同去福州动力大厦参加该两校友会理事会联席会议,到会的约100人,其中不少是道路专业毕业的,服务于交通、城建、林业、机场等部门;有的是毕业时即分配在福建工作,也有的是福建籍毕业生毕业时分配往外省市工作,后因改革开放,人才流动,又回到福建工作,其中有程景颐、杜经海、郭永健、姚国芳、于正英、吴大元等人。我们参观了福州市区及闽江边的荔园新屯,感到福州变化巨大,已不大认识了,校友会还送我横挂匾额一幅。

关于我退休后所参加清华大学校友会南京分会活动以及接待海外清华同学校友情况:首先是1987年4月26日在模范马路自动化研究所召开的庆祝清华建校76周年纪念会,观看了前线歌舞团演出节目,到会的有吴伯修、方左英、范从振、刘光文、秦宣夫等人。1988年8月清华设置施嘉炆奖学金并广泛征集资金,我即汇款150元人民币给校友总会作为该项基金。1991年4月21日我去南京理工大学参加庆祝清华建校80周年纪念会,到会的有刘光文、张佩林、郭会邦、侯国器等,江苏省副省长莅会讲话,清华派李博信来参加,我也在大会上发言祝贺。1993年4月25日为清华母校82周年校庆,又是我班级同学毕业60周年纪念日,我同老伴前往北京参加盛会,刘光文也从南京前往,会议在工字厅举行,到会的有王铁崖、王学俊、傅承义、黄中孚、程裕棋、陈得君、张捷迁等同学,施嘉炆老师和张维副校长也莅会指导,与全体同学合影、植树、聚餐,并乘车绕校园一周参观后散会。同时我还写了一篇《毕业六十周年述怀》文章,刊登于《清华校友通讯丛书》复28册,1993年10月出版。1994年4月24日我还同吴伯修去南京邮电学院参加庆祝清华建校83周年纪念会。1994年11月和1995年5月我应清华老同学伍正诚之女伍必仪和沙玉清之子沙际德的约请,分别为其父写了悼念文章。另外,1994年11月我还写出了一篇悼念谢家泽的文章寄与其

夫人孙以芳,后被登入水科院主编的《谢家泽文集》。



返校参加清华毕业 60 周年活动与老同学留影并植树纪念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是我少年时期读书学习、接受启蒙教育的地方,我和老伴家里有不少兄弟姐妹在该校学习过。1996 年是她 95 周年华诞,1994 年我应该校的约请,写了一篇《在北京师大附中读书的回忆》文章,刊登于《树高千尺颂根深——校友忆附中》。

我退休后共参加了三次党员重新登记,第一次是在 1990 年 5~6 月间,听完动员报告后,我和徐百川、方左英三人被安排在一个学习小组,在兰园招待所学习了 6~7 次,阅读有关资料并讨论,最后写出学习总结并填党员重新登记表,交道路党支部。第二次在 1992 年 1 月,第三次在 1994 年 6 月,都是民主评议党员登记,先阅读有关资料,再写学习小结,并填写党员登记表交道路党支部。

随着我国人民外交事务的蓬勃发展,我也进行了一些有关中波文化交流、增进中波友谊方面的工作。首先是唐念慈于 1987 年曾应波兰格但斯克工业大学 A. Tejchman 的邀请去瑞典参加国际地基基础会议的机会,顺便对波兰进行访问,当时唐也访问了驻华沙的我国驻波大使馆,见到了国家教委派去的大使馆留学生处秘书朱唯珍,1988 年 1 月我应唐和朱的要求写了一篇《赴波兰留学的回忆》一文,连同我的华沙工业大学技术科学博士文凭和论文的复印件交唐转寄我国驻波兰大使馆参阅保存。1989 年 5 月 13 日我又应朱来信要求,将我的博士论文原件一本交唐转寄给她,由她转

送北京中央图书馆保存。随后于1992年3月初通过刘先觉将我所珍藏的波兰建筑与城市规划图集赠送给东大建筑学系,1992年11月中我将所珍藏的波兰木刻版画17幅和华沙、克拉科夫、格但斯克三城市绘画作品3本赠送给江苏省美术馆,后获得该馆颁发奖状,此事《扬子晚报》有报导。1992年暑假波兰女留学生 Barbara Przywara 来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研修学习,10月10日唐念慈夫妇在江苏省政协办公厅(前总统府花园)邀请她游园,合影留念,并设晚宴款待,我同江嫫奉陪,Barbara 还将我前寄给朱唯珍的博士学位论文带还给我。1993年夏 Barbara 学成回国,5月24日唐念慈在长江路汉府饭店设晚宴饯行,请波人 Andrej Zawadzki、梁海棠夫妇和我奉陪。

1996年3月初庆贤儿出差路过南京称,北京外国语学院波兰语系朱唯珍教授通知我将以前在波留学所获得的华沙工业大学技术科学博士学位证书和论文以及我的生平事迹传略各复印两份,我遵照复印好交给庆儿转交朱,由朱转交我国驻波兰大使馆文化参赞谭平儿带往大使馆保存留念。1997年1月中旬庆贤儿来南京接我同江嫫去北京参加穆京孙的婚礼,朱于2月1日来舍看望我,并把我到京的消息告诉波兰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 Ewa Kwiatowska,参赞向大使 Zdzislaw Goralczyk 汇报后,大使表示立即要会见我,参赞电话邀请我于2月4日去大使馆参加会见。届时我带同庆贤儿去大使馆会见,大使与参赞以茶、酒、糖点招待并合影留念(该照片已刊登在华沙工业大学学报杂志1997年第10期上),还赠送有关资料,参观了大使馆。大使要求我也将博士学位文凭和论文复制一份寄给大使馆留存,我当时即赠送了《赴波兰留学的回忆》文章的复印件给波兰驻中国大使馆。回南京后又将博士文凭复印件和论文一本寄赠给波兰驻中国大使馆。6月中我还将我1957年访波时所获波兰交通部颁发的道路建筑科研院荣誉学术委员证书和我的生平事迹传略各一份复印件寄给波兰驻中国大使馆留存纪念。



我的一生  
回忆录

在波兰留学期间当地报纸介绍方福森的学习生活情况

1990年6月11日为我诞辰80周年，交通运输工程系同事约15人来舍祝贺，送来祝寿匾牌、蛋糕以及由潘谷西写的寿幛，上签有土木和交通运输两系和其他有关先生和女士的大名。吴明英代表韦钰和朱万福送来塑料花一束，唐念慈送来鲜花一束，杜深海和程景颐代表福建省和福州市两校友会联合送来祝寿匾牌一幅，蒋发林送来石膏制匾牌一块。系中同事陈荣生、邓学钧、庄海涛、沈善土、李峻利等致祝寿词后，我向他们一一答谢，最后吃蛋糕和寿面并在院中合影留念。事后又收到王秉纲、戴经梁、张崇福、陈振木等同学校友来电祝贺大寿。1993年3月1日为方左英诞辰80周年，我得到邀请前往祝贺，参加祝贺的还有朱万福、陈荣生、邓学钧、庄海涛、唐念慈夫妇等人，后吃蛋糕合影留念。此外我还参加了两次李剑晨的诞辰纪念会，均在江苏省美术馆举行画展，一次是1990年4月21日，是他的90华诞。我同江嫫前往，遇徐百川、胡乾善、唐念慈等人。另一次是1995年4月28日，是他95华诞，我独自参加，遇孙卜菁、钱钟韩、程云、张崇福、秦宣夫、郭会邦、方左英等人。

1988年5月2日凯媚安排一小汽车接我、江嫫、珩女、玫外孙女去扬州旅游观光，并访玉琪内侄女夫妇小谈。1993年4月底我利用去北京参加清华毕业60周年庆祝会之便，商请北京市公路局庄存培





领导和师生代表来家中庆祝八十寿辰后于兰园合影

和陈悦海备车参观了亚运村以及京津塘和京石两条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和收费站。1993年11月5日至12月20日我同江嫒应宁贤儿和依农媳的邀请,赴香港探亲并旅游观光。在一个半月内游览了不少著名公园,包括海洋公园、香港公园和九龙公园等,另外还参观了不少大型商场、广场、新城区、银行和街市等。11月18日晚方钰侄女自沪返美路过香港来访谈。25日上午在宁儿家接待了壁嫒三妹,她是陪同严东生来港参加接受香港理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典礼的。当日晚还应沈燕夫妇的邀请,去铜锣湾翠园酒家参加晚宴,席间尚有林坤、林森、袁家林以及其他福州同乡多人在座。回南京后撰写了三篇有关香港道路与交通方面的文章,投入有关刊物上发表。1997年4月江苏省高速公路指挥部钱国超邀请我和邓学钧参观了南京新机场高速公路路面施工现场和沪宁高速公路部分路段。1997年5月下旬福林六弟、十七嫂和小赛来南京旅游观光宿我处,除游览了鸡鸣寺外,还于25日由凯婿安排一辆汽车及轮椅送我、江嫒、珩女及玫外孙女和他们三人同去中山陵、明孝陵、灵谷寺、无梁殿、九层塔、廖仲恺墓和夫子庙等到处游览,并在迈皋桥和燕宾馆午餐。26日福林同小赛去访南航彭诚一,彭设午宴招待。

穆京孙与陈岩定于1997年1月26日在北京举行结婚典礼,庆贤儿专程来宁接我与江嫒去京参加。我们三人于19日由宁乘飞机

去京,在机上曾举行抽奖活动,我抽得头奖得日制领带一条。宁贤儿也从香港来京参加婚礼。婚礼在东三环路亮马河大饭店举行。是日天空无云,阳光灿烂,到有昌镇、昌惕、娴姝夫妇、玉平、玉泽、贤东夫妇、高家亲家母、高琨、高聰伉俪及高瑞的姐妹以及新娘的父母、祖父、外祖父、京孙和陈岩的同事等共约90人,陈娜为伴娘。婚礼仪式为传统与现代化相结合,尚称优雅隆重,其过程均摄影并录像留念,后又去娴姝处小住3天,并与宁儿、华孙去西单商场观光。2月11日晚间离京时,高聰驾汽车来接我同江姝去火车站,沿途经西直门、阜成门、西单、天安门、东单等处,看到春节灯光夜景,灿烂辉煌,超过香港。1997年5月24日忻侄孙女与黄晓梁在南京新街口福昌大厦举行结婚典礼,我与江姝、珩女、凯婿、玫外孙女都去参加祝贺。适值福林六弟、十七嫂、小赛也来南京旅游住我处,遂也顺便参加。此外还有福均弟、琪、琼、琛三侄女、厚贤、广贤伉俪以及其他有关人士等共约90人,仪式尚称隆重热闹,其过程均摄影录像留念。

1995年9月中福林六弟寄来林鑫弟妹家谱,建议我参照该家谱格式编排我方家族谱。我遂参考父亲生前所写诗词和陈叔通所写父亲传略编写出方家族谱初稿,送交福均弟和琪侄女处补充修改后,寄与福林转寄福铨哥处再补充修改后,由贤达侄输入电脑打印出方家族谱初稿。1997年5月我去福州参加东大福建校友会扩大理事会时见到了贤达侄,他建议家谱中各成员都各写一小传略以充实族谱,宣传先辈业绩有利于后代发扬光大。我就写了父亲和我本人的传略初稿并通知福林、福均弟、庆贤儿、厚贤广贤侄也编写有关家族成员的小传略并转寄贤达侄处汇总输入电脑打印出初稿。但由于我方氏家族成员实在众多,仍有待于今后继续不断补充修正。1996年初《报刊文摘》刊载了一篇题为《送日本战犯上绞架的中国大法官》的文章报导了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3月福枢四弟随同梅汝璈作为法官去日本东京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情况,我将该文章复印了2份,交庆贤儿转寄在美国的四嫂陈景珑和端侄。

至于我退休后参加接待有关人士的情况,首先是1988年4月28日参加东南大学道路教研室接待交通部公路规划设计院前副院长蔡维之和总工戴竟,并在留学生楼设晚宴招待。接着于1989年5月20日清华土木系同班同学谈尔益自台湾来南京旅游访问,我同刘光文、胡乾善、郭会邦在东大留学生楼餐厅设晚宴招待并合影留念。后来谈退休移居美国,我同他每年必互寄贺年卡。1990年5月17日江嫫的堂兄孙昌钱的长女韶菁自台北来南京探视其妹韶芸及妹夫汪谦,韶芸和汪谦及其女汪慧和汪宁在新街口同庆楼设晚宴招待,我同江嫫前往参加畅叙话旧甚欢。1994年4月1日韶菁再次来南京为其父作坟,由韶芸、汪慧、汪宁陪同来我家畅谈,我设晚宴招待。翌日韶菁在新街口金蒂大厦设午宴招待韶芸全家,我同江嫫、珩女和曹凯前往参加。1995年5月9日韶菁三次来南京扫墓,又同韶芸来舍畅叙。1991年12月11日东大统战部张玲珍陪同全国政协科技调查组严东生和张维来我家商谈有关问题。1994年2月20日清华五级历史系同学、现任台湾东海大学教授杨绍震携其女来南京观光旅游,住玄武饭店,晚间他俩来我家访谈,由我和江嫫陪同去胡乾善家小憩,并打电话通知刘光文,约定大家在山西路南京烤鸭店晤面聚餐,畅叙话旧并合影留念,胡乾善因身体不适未能参加。翌日上午刘光文还陪同杨及其女参观访问了东南大学和南京大学,我和江嫫则因身体欠佳未能躬陪。1994年5月24日公路专修科55届毕业生徐道根来访问,后又去张烈处探视,并在留学生楼设午宴招待我和陈荣生、李峻利。1995年元月宁贤和依农自香港回南京探亲,亲家俞自萍和曹京夫妇也从澳大利亚回南京。2月1日曹凯和珩女在解放南路金海岸大酒店设晚宴招待方、曹两家亲属,到场的有俞自萍、曹京全家、曹愈全家以及张佩林夫妇、孙韶芸夫妇和我与宁儿、依农等,众人欢聚一堂并合影留念。1995年6月1日南京工学院60届道路工程专业毕业的越南留学生陈文碧和1955年进入南京工学院道路专业读完一年级转入同济桥隧专业的越南留学生潘廷清两人由越南来南京母校瞻仰参观访问,由沈善土陪同来我家探

视慰问畅谈并合影留念。8月23日邓学钧访越归来,带来陈、潘送我的小花瓶2只。1995年11月6日福圭三妹自加拿大回国来南京探亲旅游,由福均弟及琼、琛两侄女陪同来我处探望话旧。1995年9月杨秀玲自澳大利亚回北京办理其房地产变卖事,12月初来南京探视其长女肖爱苹,来我处聚谈话旧,数人并合影留念。1996年4月15日我的学生、中央大学土木系1943年毕业的徐昌衡偕其夫人自美国回国来南京瞻仰母校并旅游观光,由金雨苍夫妇及其同班同学共8人来我家探望并畅叙话旧摄影留念。徐在中大的毕业论文题是《超级公路》,我是他的指导教师,我赠我主编的《路面工程》一本。1996年10月16日本长冈技术科学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系副教授唐伯明随该校访华代表团来南京访问讲学,唐是我指导的1990年毕业的博士研究生,特来寓探望畅谈并赠小礼品。

## 11 工作成就业绩小结

我在大学毕业后,就十分爱好学术写作和笔耕,并很重视有关道路专业的各项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我在从事道路专业教学、科研和培养研究生的同时,仍十分重视专业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积极参加多项道路学术团体组织,并在部分团体组织内担任领导职务,即便是70~80多岁的高龄,仍常不辞艰辛,跋涉于祖国的四面八方,出席参加有关专业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争取专业教材编写和科研项目任务。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同校外同行们进行学术交流,获取最新科技信息和情报资料;另一方面还可让校外同行们获知我们学校道路专业学科的发展情况,扩大学校的对外影响,这样对学校道路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也会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

为了配合教学、科研和培养研究生的需要,多年来我撰写了80多篇学术论文和6本教材专著。由于我通晓英、俄、波兰等国语言,我还翻译了27篇学术文章资料和9本外文书籍专著。这些文章资料和书籍专著,有的是科研成果的总结,有的是国内外道路工程建设管理和科研工作的回顾、现状综述以及今后发展前景,有的是对我国道路建设管理提出改进意见,也有的是介绍外国的工程技术规范和规程。



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时合影(前排左十是方福森)

我还接受其他单位或个人的委托,审订其所编写的书稿并提供审查意见共7件,其中:①《南京近代公路史》是1986年我担任该《公路史》的特约审稿员,接受南京市公路管理处史志编审委员会的委托而审订的;②《江苏省公路交通史》第一册是我接受江苏省交通史志编纂委员会的委托而审订的;③《道路与交通工程词典》是我担任了该《词典》的审订委员而审订的。以上三单位所召开的审订会我都参加了。

1964—1966年间我曾担任教育部《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土建水版编审委员会委员,负责处理有关道路工程学科文稿的编审工作,此外,我还为其他有关高等学校、科研单位、学术团体和杂志刊物评阅和审校科研成果、设计文件、技术规范和翻译资料共约100多件,其中较重要的有《城市道路设计规范》《厂矿道路设计规范》《水泥砼路面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京津塘地区主要干线公路现状及其发展的研究》《福厦交通特尔斐预测研究》,以及《中国公路学报》所寄来的文稿等。我还为国家教委等单位评审有关高等学校申请科技进步奖研究项目所提交的论文报告并提出综合评审意见,其中同济大学5项,北京大学和西安公路学院各1项。

在科学研究方面,1956年10月前南京工学院召开第一次科学报告会,我主持了道路工程专业分组会,并提交宣读了题为《中国道路建筑发展史》的论文,其后南京工学院多次召开科学报告会,道路工程专业分组会大多由我主持并提交论文宣读。60年代前期,我对用弯沉仪测定路面强度(包括 Benkelman 梁式和落锤式两种弯沉仪)、路面不平整度的测定、路面分等与所适应的交通量和最高车速、塑性水泥砼路面和水泥砼路面调查研究等课题进行了试验研究并写出论文报告。1972年南京工学院道路工程教研室同浙江省公路勘察设计院合作对水泥砼路面进行较大规模的研究,并在台州铺筑试验路。1977年我撰写了《水泥砼路面疲劳试验研究总结报告》,以教研组署名,刊登于《南工学报》1978年第2期,获得交通部1978年科学大会奖。

除此而外,我参加了1975—1977年间道路工程教研室同江苏省交通厅合作进行华东地区柔性路面力学参数的普查测试工作。1983—1986年间我参加了交通部科研所主持的“路面发展方向和材料问题”的课题研究,撰写了《水泥砼路面与沥青砼路面的经济、能耗与技术性能比较分析》,被选登入《公路水运技术政策论文选》1985年第4期,获得交通部1986年优秀成果三等奖。此外,1976—1980年间南京工学院道路工程教研室接受江苏省交通厅的委托,组织有关教师率领道路工程专业毕业班学员作为毕业实习和设计,进行全国第一条一级公路——宁六(南京至六合)一级公路的路线和路面路基的勘测设计和科研工作,后由该厅成立工程指挥部组织施工。该指挥部所召开的路线、路基和路面讨论会、全路竣工验收会以及通车典礼会我都参加了,而且



亲临全国第一条一级公路宁六公路现场

在 80 年代初该路路面局部发生损坏,我还参加了该指挥部历次召开的路面损坏原因分析会和加固方案审订会。

至于培养研究生工作,早在 1956 年即已开始进行,但当时国家没有颁布授予学位的制度,直到 1978 年南京工学院道路工程专业才有了硕士学位授予权,1990 年又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点。我培养了无授予学位制度的研究生 2 名、硕士 10 名、博士 2 名。我培养的研究生都是以路基路面工程为研究方向,每年入学考试专业课程“路面工程与建筑材料”都由我命题、监考和评卷。研究生入学后的学习和研究计划,包括课程设置和研究试验要求都由我安排,论文也是围绕路基路面工程科研方向进行选题,最后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也 由我安排并参加。我还是南京工学院土木和建筑两系学位评审委员会委员,参加每年一次的该两系毕业研究生的学位评审工作。

另外,我还为南京工学院道路工程专业其他研究方向的毕业研究生以及上海同济大学和西安公路学院等高等院校道路工程专业研究生评审毕业论文,并参加答辩委员会担任主席或委员,其中无授予学位制度的 1 名、硕士 18 名、博士 3 名。80 年代以来,我还为南京工学院以及其他高等院校和机关单位出国留学和进修人员,向外国有关高等院校、研究单位或专家、教授书写推荐信共 13 次。

1984 年南京工学院即向国家教委推荐我为道路工程专业学术带头人和博士生导师,1985 年 5 月还函请同济大学朱照宏教授、西安公路学院张登良教授和南京河海大学刘光文教授写推荐信,上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申请博士学位授予权点,我为博士生导师,但终因我年事已高未能获得批准,实属憾事。与此同时,我曾应同济大学的函请,为该校朱照宏教授和姚祖康教授写出申请博士生导师的推荐信。1989 年 4 月我还接受西安公路学院的邀请,前往该院参加为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申请博士学位授予权点所召开的论证会。

交通部和教育部所召开的全国性道路与桥梁工程专业教学计划与各门课程教学大纲制订会以及教材编审会议共 23 次,我基本上都参加和主持了。1961 年 3 月交通部委托西安公路学院在上海召



开首次公路与城市道路专业教材编审会,并成立路桥专业教材编审小组,我担任组员兼召集人。1981年4月交通部成立了高等学校道路与桥梁两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我被聘为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2年4月交通部在长沙召开道路与桥梁两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讨论第二版教材的分工编审事宜,决定由我主编《路面工程》,1987年6月该书出版,为全国各高等学校有关专业广泛采用,被纳入辽宁科技出版社1990年6月出版的《中国优秀科技图书要览》,1993年获交通部优秀教材一等奖。

关于公路科技信息情报工作。我于1973年9月首次参加在甘肃省酒泉召开的西北片区公路科技情报网会议,接着于1977年4月又出席了在安徽省蚌埠市举行的华东片区公路科技情报网成立大会。该情报网在1987年以前历次所召开的工作会议和科研学术会议,我基本上都参加了并提交和宣读论文。同时我还担任该情报网所出版的《华东公路》双月刊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为该刊撰写和审查了不少文稿,1982至1984年连续3年获得华东片区公路科技情报网奖。1985年我还受全国市政工程科技情报网的委托,撰写《国外道路水泥砼路面的工程技术现状综述》,被登载入情报网所出版的《城市道路国内外水平调研报告》,获得1985年该情报网优秀情报奖。

关于我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写审订工作情况。1980至1986年间我曾担任该《全书》土木工程卷道路工程分支学科编写组组员,除撰写“公路”“高速公路”和“水泥砼路面”三个条目的释文外,还参加了该分支学科历次所召开的编审会议。另外,我还为该《全书》交通卷公路工程分支学科撰写了“公路路面”“公路路面设计”“石料路面”和“水泥砼路面”4个条目的释文,并参加了该分支学科所召开的2次编审会议。

1959年我曾担任中国土木建筑学会公路工程委员会委员。1962年曾担任国家科委公路组组长,1978年曾担任中国公路学会副理事长,1985年改为名誉理事,1994年改为荣誉理事,与此同时,

我还担任道路工程学会和交通工程学会的理事。1979年我曾担任江苏省公路学会副理事长,1984年改为顾问,1989年改为名誉理事,1994年改为荣誉理事。1980年我还担任交通部道路与桥梁公司技术顾问,1983年任江苏省交通运输协会理事。我所出席参加全国性有关道路与交通工程专业科学技术会议共65次。我所出席参加江苏省和南京市召开的有关道路与交通工程专业科学技术会议共67次。

为开展国内外有关道路与交通工程学科信息情报的学术交流,我还多次同道路工程教研室有关教师,有时还有其他兄弟单位部门同行一起接待有关道路、桥梁与交通工程学科外国专家、学者和团体乘来华探亲或旅游观光之便来讲学或座谈共27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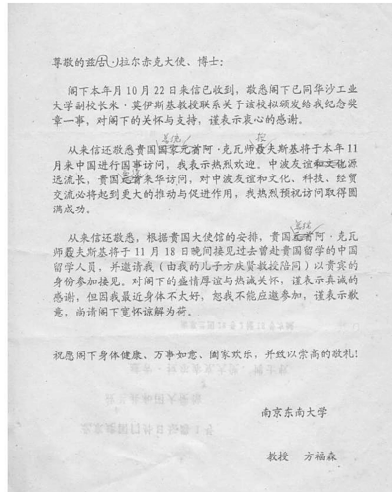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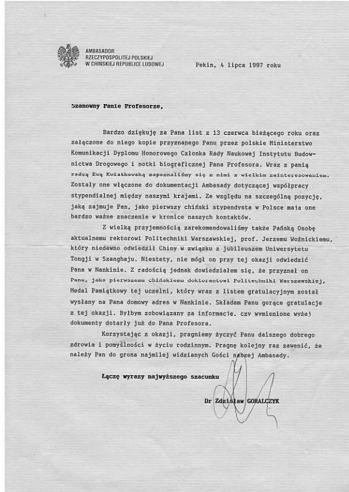
70年代末期以来,我多次参加道路工程教研室教师提升职称的外文考试命题和评卷工作,并多次参加土木工程系为评审教师提升职称所召开的会议。我还多次评审其他高等院校教师和有关单位部门科技人员为提升职称所提交的著作和论文并提供提升意见。1981年起我还是江苏省交通科技干部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出席参加了多次江苏省交通厅为评审科技干部职称所召开的会议。我还同唐念慈共同参加江苏省交通科技干部提升职称外文考试的命题和评卷工作。

我一生所担任的机关部门和学术团体职务,包括专职15项和兼职48项;我所获得的奖励和荣誉共28项,其中较突出的有波兰交通部颁发的波兰道路建筑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荣誉学术委员、交通部1978年科学大会奖、交通部颁发的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荣誉证书以及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共4项;录入我简要传记的辞书共4种。

## 12 结束语

自1933年我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至今已为国家社会服务了60多个春秋。如果从我在道路工程学科领域里工作学习的年代算起,那就要追溯到1936年我去波兰留学攻读道路工程的年代,至今也有61年。如果从我在高等学府从事道路工程教学、科研与生产工作算起,那就应追溯到1941年我进入中央大学任教授的年代,迄今也有56个春秋,超过了半个世纪,如果说我在教学、科研和学术上有点滴成就,那都是在新中国建立后取得的。我深深体会到“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而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个人的一切”的千真万确,而且这些点滴成就主要是在党的培养与教育下,清华母校“自强不息”校训精神的熏陶与激励和德智体全面培养方针的贯彻下,师长们的谆谆教诲与正确引导下,领导们的鼓励与鞭策下,同窗学友、同事与兄弟姐妹们的相互切磋与协作下,以及晚辈同学们的推崇和热情帮助下所取得的,对此我谨表示衷心的感谢与崇高的敬意。

最后还要指出,我和老伴江姝在风风雨雨、峥嵘岁月中,伉俪恩爱相伴度过了59个春秋,在家务劳动、教育子女方面,她全都包揽下来,付出了巨大精力,使我在教学、试验研究、出差、开会、写书、写文章、搞翻译等工作活动中,能够全力以赴、一心一意、努力拼搏、奋勇前进,而无后顾之忧,我所获得的点滴成就,至少有一半应归功于我



我的一生  
回忆录

波兰大使邀请方福森参加波总统访华接见及方先生的回函

的老伴江嫒。我虽然已经退休了，我还要在风烛残年中发挥余热，为祖国的和平统一、改革开放，为我国的道路交通现代化建设和培养接班人，做出我力所能及的贡献。

86岁老人方福森写于南京兰园

1996年12月

## 后记

在东南大学建校 115 周年之际,为更好地在交通领域为学校发展做出贡献,交通学院拟举办交通运输工程一流学科建设暨方福森教授教育思想研讨会。借此契机,又时值方老诞辰 107 周年,为全面总结和传承方福森教授教育思想,我们编纂出版《我的一生——方福森教授自传及弟子亲友回忆集》一书,在向母校献礼的同时,以为纪念。

方福森教授是波兰华沙工业大学博士,是中国留学波兰第一人 and “一带一路”的早期使者,参与抗战时期的公路修建及抗战交通人才的培养工作,是我国道路工程教育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也是我校交通运输学科的创始人之一。方福森教授治学严谨,学术成就非凡;授业不断,桃李芬芳四海;为人高尚,品格高山仰止。他为后人留下珍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值得我们铭记和学习。

东南大学交通学院高度重视本书的编纂出版工作,成立了工作组,交通学院党委书记秦霞和院长刘攀分别担任正副组长,负责总体协调。受学院委托,由我带领部分道路学科的师生开展具体工作。

本书是在未正式出版的方老自传《我的一生》及邓学钧、陈荣生编辑的方福森教授纪念文章的基础上编纂而成。书中第一部分为方老的“回忆录”;第二部分“秋实录”,为方老工作期间的相关教学科研情况以及参加社会工作等情况;第三部分“恩情录”,收录方老谈母校、谈师友的相关文稿;第四部分“追思录”,为纪念方老的相关文章;第五部分“永久的纪念”,亦是表达对方老的情感与纪念,以求从不同时间不同角度全方位反映方老不平凡的一生和对我国交通

事业和工程教育的卓越贡献。方福森教授是我校交通运输学科建设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对方老一生的回顾,也从侧面记录着东南大学交通学院的发展历程,映射着一代又一代交通人“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

本书的编纂出版是在我院师生及各界校友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方老学生重庆交通大学唐伯明校长及团队对方老在陪都重庆岁月及其教育思想进行了深入挖掘、梳理和定位;学生马羊、吴淑印、刘伟、杨婉玉、谢磊、涂珊珊、王伟立、赵润民、郑玉冰等完成了文字录入及部分编辑工作;校友李树光,交通学院教师陈先华、杨军、杨若冲以及土木工程学院前书记张星等对书稿进行了校阅并给出了宝贵建议;校友杨洋也帮助做了许多文字润色工作和文案工作;东南大学出版社总编张新建是我院道路专业毕业生,在本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中更是投入了很深的感情。

本书的出版还得到了方老女儿方珩的大力支持,方珩女士对全书进行了仔细校阅。

方老的硕士研究生,现任科技部副部长黄卫院士为本书倾情作序,表达了对昔日恩师的缅怀之情,并对本书的出版给予充分肯定。

这些都保障了本书的顺利出版,在此向他们付出的劳动表示深深的感谢!

因书中涉及的部分人、事时隔久远,特别是波兰文的人名、地名,难免存在考证、校对上的不足,望读者谅解。

交通学院 程建川

2017年5月